

研究與方法

NARRATIVE ANALYSIS

# 敘說分析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Catherine Kohler Riessman◆著

王勇智、鄧明宇◆合譯

丁興祥◆校訂





# NARRATIVE ANALYSIS

CATHERINE KOHLER RIESSMAN  
Boston University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Volume 30

## NARRATIVE ANALYSIS

Copyright©1993 by Sage Publication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utiliz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2003 by Wu-Nan Book Inc.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age Publications, Inc.

# 譯序

## ～一種實踐的印記

「敘說研究」在國內逐漸受到重視，「敘說」不僅是在日常生活說故事、聽故事、甚至寫自己故事的現象，而且更逐漸成為學術研究的新典範。國內向來有科學崇拜的迷思，對「科學」甚少反省。其實，科學研究的對象可以是「自然」，也可以是「人」。若用研究自然的方式來研究人，本身便是「機械論」及「化約主義」的思維，從牛頓啟蒙運動直到迄今，都是這樣的「科學」思維。但我們逐漸反省到，人不是機械，研究人有更合適的科學研究方法，例如「敘說」是其中之一。這樣的思索是涉及到對「人」根本隱喻的假設，基本假設的轉換便是科學典範的轉移，這對一個領域的創新非常重要。不論何種領域能夠創新都是不容易的，這不但涉及了思維的轉變，還涉及生活的慣例以及權力的結構，以契克森米哈里（Csikszentmihalyi, M.）的觀點，這涉及系統的改變。「敘說典範」的興起，便是許多人在既有的

學術系統中投入長久努力所累積出的一點成果，在「人文及社會科學」中樹立一個新典範，這代表科學對人根本隱喻的轉變，以不一樣的「視框」研究人。「敘說研究」現象標誌了國內學術創新領域的興起。

我在研究所開設「敘說」相關課程已逾十年，那時幾乎沒有中文的敘說書籍可以參考。一路教與學的過程中，最常被問到的問題是：「何為敘說？」漸漸地，坊間陸續出現討論敘說在方法學（methodology）上定位的相關中文書籍，大家對敘說有些概念後，接著產生的提問是：「如何進行敘說分析？」「有沒有相關的中文書籍？」近年關於敘說的中文書籍，大部分是治療領域在實務經驗上的案例報告，還有些生命史和史學界的作品。這些中文出版品讓讀者更了解敘說的發生、歷程及作用，然而卻不太能回應讀者「如何分析」的學習需求。**Riessman** 這本《敘說分析》的中譯本，可以說是在學習「敘說」的光譜上，有著關鍵性的開拓。**Riessman** 這本《敘說分析》在理論脈絡下，討論了三種不同的敘說操作模式（models），讓讀者在讀敘說資料時，不僅只欣賞故事，還能進入分析性思考，接著 **Riessman** 提供了如何分析的具體方法，最後討論評估標準及這種分析的限制。這樣的組織實在有助於有意學習敘說者很快地進入敘說分析的世界。

這本書中譯本的誕生，對於我和兩位初稿譯者也有標誌



性的意義。兩位初稿譯者王勇智和鄧明宇在碩士班時，就和所上幾位男同學組成男性敘說團體，一同在團體的支持下檢視、重構自己身上的男性經驗，兩位也由此發展出跟男性經驗自我敘說有關的碩士論文。不僅如此，在彼此經驗說到很多很多以後，他們更進一步思考怎麼樣才能夠讓這樣的敘說更有積極的作為，做些更有意義的事。他們討論很多，將敘說知識翻譯成中文介紹給大家，應該是很有價值、很具社會意義的，所以邀我一起成為工作夥伴。和他們共事翻譯對我而言是一種教與學的過程：他們將初稿和我討論，在討論之中又廓清我們對敘說的一些看法。一方面我也從我過去及目前所做的敘說研究中參照出不同領悟，而這樣的領悟也會部分反映到譯文的傳達上。翻譯的過程，就是不斷蛻變的過程。就如書中所說「任何作品的建構總是彰顯了某些創作者的印記」。一路走來，這本《敘說分析》的譯介，對於我們來說，不僅在介紹一種合適研究人的方法，也是一種開展生命的途徑，更是一種讓學術走向大眾的社會關懷。無論對於敘說研究的學術發展或對於我們的生命，在很多層面，它都是一種真真切切的實踐印記。

——丁興祥

於輔大心理所



# 編者前言

本書是 Sage 出版社質性研究方法叢書的第三十冊，在這本書中，Catherine Kohler Riessman 把敘說分析方法變得更系統化，對實務工作者更為有用。基於過去的接觸，她介紹並闡明了以敘說分析的形式對女性生命與健康進行研究。雖然關於敘說，以及敘說在生命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已有許多的著作，但是關於敘說分析的原則——如何進行與背後的緣由——相關的論述還很少。

作者首先以個人的敘說，為自己與她的工作作定位，然後解釋三種敘說分析的類型，指出它們相對的優缺點。在這本書的第三個章節，她將展現自己如何進行敘說分析，從訴說到轉錄、再到分析。對於那些掙扎於文本當中的人，她詳實而清楚的逐步說明，為他們顯示了一個良好的典範，而非只是著重在技術層次上。

這本書也放入了 Riessman 對離婚敘說和女性處境和健康問題的分析，因此這不僅對方法層面有所貢獻，也對女性生命與福祉的實際研究也有所助益。

——Peter K. Manning

John Van Maanen

Marc L. Miller



# 關於作者

Catherine Kohler Riessman 是波士頓大學社會學系和社會工作學系的教授。由於她同時是一名社會工作者和一名社會學家，她也帶領了一個博士班學程以整合此兩個學科。她是《離婚話語》（*Divorce Talk*）（1990）、《社會工作探究的質性研究》（*Qualitative Studies in Social Work Research*）（Sage 印行中）和許多學術論文的作者，在她的研究和出版品中，都檢視了女性和健康、社會階層和社會健保、性別和離婚之間的關係，最近的工作則著重於新興的敘說研究。她開的課包括了家庭社會學、醫療社會學、家庭理論、研究方法和質性分析。Riessman 目前正著手於一個不孕症的研究，由「國際學者交換協會」（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Scholars）所支持，第一個階段將進行印度（Kerala 省）不孕婦女的參與觀察和訪談。她還活躍於「社會工作博士教



育促進團體」(Group for the Advancement of Doctoral Education in Social Work)，以及「美國社會學學會」(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的「醫學社會學分會」(Medical Sociology Section Council)。



# 序

## ～自我的定位

任何作品的建構總是彰顯了某些創作者的印記。因此，在正式討論敘說分析之前，首先，我將說明自己的位置，以及形成這本書的脈絡及其主要的觀點。

社會學、心理學和社會工作的學生和同僚督促著我寫這本書。他們來到我的研究室，談到一種彷彿淹沒於訪談逐字稿大海中的經驗，要求有「某種」參考本或資料來源，以幫助研究的進行。我記得當中包括了一位資深的臨床心理教授，那時她剛開始進行童年時受到性侵害婦女的復健研究：第一次訪談就進行長達十個小時，得到了將近三百頁的訪談謄本，資料提供者說了許多關於生命重要時刻的故事。我的同僚把此當作是一種來自於臨床經驗的敘說和閱讀資料，顯然她曾接受過許多主流的研究方法訓練，卻無法讓她應付所蒐集到的這些文本。她需要另一種方法論的資源。於是，我

指引她參考社會語言學家（sociolinguists）和其他學者，對於敘說所完成的各種不同成果。這些範例常被拒絕於社會科學研究傳統所建立的期刊和所編集的印刷品之外，雖然談話（talk）常常是研究的對象，但是在關於質性研究法的研究文獻中，要如何接近那些採用敘說陳述形式的長段談話，卻幾乎是闕如的。

我博士班的學生們也刺激了這本書的產生，在 1992 年這個值得紀念的「臨床資料的質性分析研討會」（Qualitative Analysis of Clinical Data）上，我們一起探究了和敘說有關的文獻，而他們很有創意地使用這些概念，來分析他們在訪談研究中所蒐集到的綿延談話——這些包括了成為母親、得到乳癌、種族的經驗。我們討論時所產生的許多想法，構成了這本書的基礎。

我最初感受到敘說的力量，必須回到許多年以前。1950 年代末，我正在 Bard 大學研究文學時，那時授課教授促使我，超越只是「愛」一本書，而能進一步檢視它是如何被建構的，我記得受到 Dwight Macdonald 的指導（當時我還不知道他在文學批判上的重要性），我們檢視了 Joyce\* 的《尤里

---

\*譯者註：愛爾蘭現代小說大師——喬埃斯。



西斯》（*Ulysses*）是如何產生出來的。幾年後，當我在哥倫比亞大學的醫療社會學（*medical sociology*）受到良好的研究所訓練，不幸地，這與文本的解釋似乎沒有什麼關聯，雖然一個可能的後果是對研究方法產生強烈興趣。但是一直到最近幾年之前，敘說和社會學對我來說，幾乎還是互相分離的。

因為沒有適當的話語——一種方法上的語言，我對於說故事一直沒有太多的關注。在 1960 年代末，我成為一個臨床的社會工作者，我必須聆聽個案，幫助他們把困境的事件變得有意義，放入一個解釋的序列裏，但我從未想過治療對話可以當作研究材料，並系統的進行探索。在女性運動興起的初期，我參加了一個意識覺醒團體。當我們在房間裏圍繞著，依序地描述我們個人的經驗時，許多人都開始看見身為女性所受到的共同壓迫。我們有些人開始思考，這些陳述似乎可以成為生命的資料和文本，並透過解釋顯現出社會、文化、個人及政治的交互關聯。

敘說和社會學在我心中彼此相互關聯起來是在 1980 年代。那時我指導 Naomi Gerstel，進行一個關於性別和離婚的研究計畫（*Riessman, 1990a*）。在結構性的訪談裏，女性和男性在對話裏把握了每個機會，希望告訴我們關於他們的經

驗。有些人發展出一長篇的陳述，說明他們的婚姻中發生了什麼，為何導致他們的離婚。我那時並沒有理解到這些就是敘說，直到我費力地登錄（code）這些資料。運用傳統的質性研究法，我企圖尋找這些文本的共同主題元素，但有些個案把數個主題編織成為一個統合且有次序的長篇陳述，使我無法進行簡單的分類工作。後來我發現自己並不希望把這些長篇的陳述碎裂成分離的主題類別，因為這些談話，似乎有個共同的結構表現了不同的主題內容。當我登錄其中一個訪談時，有一位受訪者為我的困境提供了言語，儘管之前我就已經有了這種想法，但對我而言，那是一個「關鍵時刻」，使我成為一個敘說研究者（Fonow & Cook, 1991）。

當被要求「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明離婚的主要緣由」時，這個男人笑了笑說：「好吧！你知道，這真是一個很長的故事，但也許我可以概略地這樣說……」我看到人們如何嘗試說一個長的故事，關於他們結婚的經驗以及之後的情況。儘管我希望成為一個好的社會科學家，儘可能將訪談程序加以標準化，以得到可比較的資料，並將它們登錄成為一組共同的主題類別，但個人是透過說故事扼要地重述他們的生命，並重新加以解釋。

在我的博士後研究工作經驗裏，Elliot Mishler 是一位不



可多得的老師。他指導我去思考把訪談視為一種敘說。就像現在求助於我的學生一樣，當我在 1984 年到了哈佛醫學院的社會精神病學實驗室（Laboratory in Social Psychiatry）（感謝 NIMH\* 的資助，#5F32MH09206 字號），也是淹沒於訪談的逐字稿裏。但他教我從敘說理論、社會語言學和解釋社會科學（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去尋求資源。他再度點燃了我在 Bard 大學之後停滯的興趣，從仔細的文本分析裏：看出一個敘說是如何被建構的，以及一個說者如何修飾性地創造它，以表示特定的想法。之後，他又帶領我進入人類學的批判文本裏，我將這些想法加以發展，成為第一章的再呈現層級。

總而言之，在這本關於敘說分析的書裏，放入了關於我的個人故事，是因為我有某種研究的立場，而人際的網絡會影響到呈現在這裏的想法。在這本書裏所介紹的這個取向，是循著 Labov-Mishler 的模式所建立並加以延伸的，另外還受到我在文學、社會學、臨床工作、教學和性別政治等經驗上的影響。由於我跨領域的認同，也許我會使用的分類術語，並不強調我所引述學者的學術位置，因為不可能完全從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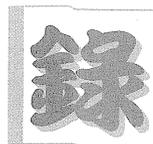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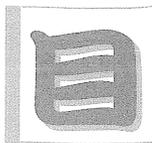
\*譯者註：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外部觀點來看任何的主題，而這本書也不例外。

這本書的完成受到我的朋友與同僚不少的幫助，我要感謝 Virinia Olesen 和 Adele Clarke 邀請我於 1991 年在 Stone 座談會中報告，這個研討會是從符號互動研究的角度來看社會，而寫這本書的想法就是於此誕生的；Peter Manning 和 Marc Miller 對早先的草稿提供了不少的回饋；Susan Bell, Jane Attanucci 和「哲學之友」（Philosophical Friends）這個學習團體，給予我不少的支持和鼓勵，並提供了具深度的批評；跨領域和跨校際的「敘說研究團體」（Narrative Study Group）的對話，在許多方面型塑了我的想法；Elliot Mishler 欣然地閱讀了好幾次草稿（特別是 Cathie Rocheleau 所打字的），給予了關鍵的批判，並促使我為自己定向；Michelle Huber 仔細地核對書目中的每個文獻；Sandra Everson-Jones 準備了圖表；Mitch Allen 在適當的時候表現了他的熱衷。最後，無論如何，我要謝謝我的學生，在學習和教學、訴說與傾聽中，最後產生了這本書。

——於 Wellfleet, MA





譯序：一種實踐的印記／ 1

編者前言／ 1

關於作者／ 1

序：為自己定位／ 1

**簡 介** 為敘說定位／ 1

個人敘說視為研究的資料／ 6

敘說研究／ 9

本書的組織／ 13]

**第一章** 理論的脈絡／ 17

經驗的再呈現／ 19



- 關注經驗 (attending to experience) / 22
- 訴說經驗 (telling about experience) / 23
- 轉錄經驗 (transcribing experience) / 26
- 分析經驗 (analyzing experience) / 30
- 閱讀經驗 / 31
- 再呈現的限制 / 34
- 敘說視為一種再呈現 / 37
  - 什麼是敘說? / 38
  - 敘說的結構 (narrative structures) / 41
  - 訴說的形式：脈絡和意義 / 43
  - 敘說的真實 (narrative truths) / 48

## 第二章

### 實作模式 / 55

- 生命的故事 / 59
  - 敘說方法 / 60
  - 問題 / 68
- 從對談資料中聯結故事和意義 / 75
  - 敘說方法 / 76
  - 問題 / 88
- 詩的結構和意義 / 94
  - 敘說方法 / 95
  - 問題 / 108



**第三章** 進行敘說分析／ 117

訴 說／ 119

轉 錄／ 124

分 析／ 131

**第四章** 結 論／ 141

有效性 (Validation) / 143

說服力 (persuasiveness) / 146

符合度 (correspondence) / 147

連貫性 (coherence) / 149

實用性 (pragmatic use) / 151

無教條 (no canon) / 153

敘說分析的使用和限制 / 154

參考文獻 / 159

名詞索引 / 185



簡 介

# 爲敘說定位

---



敘說研究無法完全歸類於任何單一的學術領域。本質上它是跨學科的，它可延伸至所謂社會科學的「解釋的轉向」（interpretive turn）（Geertz, 1973, 1983; Rabinow & Sullivan, 1979/1987）。自然科學方法的實在論假設，對於社會生活的理解有相當的限制，於是一群來自不同領域的美國學者，轉向將敘說視為人類行動的組織原則（Bruner, 1986, 1990; Cronon, 1992; Rosaldo, 1989; Sarbin, 1986b; Schafer, 1980, 1992）。歐洲理論的發展，已經為這種「敘說轉向」（narrative turn）提供了基礎（Bakhtin, 1981; Barthes, 1974; Ricoeur, 1981, 1984）。Todorov 在 1969 年創造了「敘說學」（narratology）這個詞，企圖鼓舞此種知識形式——「這是一種關於某種知識的科學」（引自 Godzich, 1989, p.ix）。

說故事，簡單來說，一方面是指資料提供者（說故事者）對我們所做的事，另一方面是指我們對研究材料所做的事。故事的隱喻，強調我們是在特定的脈絡底下，去創造次序、建構文本<sup>1</sup>。然而，自然科學所採取的機械隱喻（之後我們將逐漸加以質疑），暗示我們可以對這個世界的力量是如何運作的，提供一個客觀的描述，而我們自己是以客觀者的角度如此做。

敘說分析的立場是以故事本身作為研究的對象。我在這裏的討論，只限於受訪者關於他們經驗的第一人稱陳述（**first-person accounts**），暫時不管其他類型的陳述（例如：我們對於實際場域發生了什麼所進行的描述，以及其他研究者的敘說，包括關於理論的「大敘說」（**master narratives**））<sup>2</sup>。我們主要的目的是在了解受訪者在訪談時，在經驗流裏如何賦予條理及次序，使得他們生命裏的事件和行動變得有意義。方法論的取向是在審視報導者的故事，以及分析其故事是如何組成的，故事相關的語言學和文化的來源以及故事如何能使一位聽者相信它的真實。敘說研究的分析，開啟了訴說經驗的形式，而不僅僅是語言所指涉的內容而已。我們要問的是，這個故事為什麼是這樣說的？

自然界和這個世界本身並不會說故事的，但人卻可以。因為敘說就是一種再呈現（**representations**），解釋常是不可避免的。在後實證主義的研究裏，事實和解釋是不易區分的（**Stivers, 1993**）。人類的行動和想像決定了哪些事情會包含於敘說裏，哪些則否，事件是如何被情節化，以及事件的意義為何。個人是在個人的敘說裏，建構了過去的經驗和行動，用以宣稱他們的認同，以及型塑他們

的生命。

個人是如何重述他們的歷史——他們強調了某些部分，又忽略其他的；他們的姿態可能是主導者或受害者；故事在說者和聽者之間建立了如何的關係——這些皆會型塑個人對他們自身生命的宣稱。個人故事不僅僅是告訴某人（或自己）關於自己生命的一種方式，也是他們的認同賴以形成的工具。（Rosenwald & Ochberg, 1992b, p.1）

不僅僅是訊息儲存機制，敘說也構成了知覺經驗、組織了記憶、「生命的片段及目的——建構了一個生命的真正事件」（Bruner, 1987, p.15）。個人成為他們所訴說關於自己生命的自傳式敘說（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s）。這些個人建構的故事若典型地與一個社群的生命故事相契合，將可反映生命本質的「深層結構」（deep structure）。

## 個人敘說視為研究的資料

把個人經驗的敘說視為分析的對象並不困難。因為在每天的生活裏，它們是無所不在的。我們都可以想像有人們的對話，某人會非常詳細地說她說的是什麼、而他說的又是什麼、接來會發生什麼事等等，大致地重述對她有特別意義的每個微妙時刻。心理治療師每天會遭遇到個人經驗的敘說，藉由重述和建構新的和更可能實現的敘說，以改變生命（Schafer, 1992; White & Epston, 1990）。敘說關於過去事件的故事，似乎是一種普遍的人類活動，這是我們兒童時首先習得的言說（discourse）形式之一（Nelson, 1989）。在各種不同環境，各種社會階層的人，其整個生命進程（life course）都會使用。H. White（1989）曾言：「敘說的衝動本來就是一種天性。」若想說明一件事情是如何發生的，敘說是不可避免地。它解決了「如何把認識（knowing）轉換成訴說（telling）的問題」（p.3，如原文中所強調的）。

研究訪談也不例外。受訪者（如果沒有受到標

準化問題的干擾)幾乎都會幾經轉折,有時會把回答組織成一個長的故事。質性分析的傳統取向常會根據解釋和概化的需要,而把這些文本加以分割成東一塊西一塊,完全不考量其脈絡性。他們去除了敘說陳述中所具有的系列性和結構性的特徵(關於主流方法對敘說的壓抑的評論,請參閱 Mishler, 1986a)。

個人敘說的精確定義還是一個爭論的問題,之後將會討論。目前,敘說是指關於結果事件而組織成的訴說。說者把聽者帶入過去的時間或世界裏,簡要地重述事情的經過,並提出一種觀點,通常是與道德有關的。在質性研究的訪談裏,基本上,大部分的談話並不是敘說,而是一問一答的交換、爭論和其他形式的言說。

受訪者把他們生命中特定的經驗加以敘事化(narrativize),通常會存在現實和理想、自我和社會之間的裂縫,我所研究的個案常談論他們婚姻的冗長故事,用來解釋他們離婚的原因(Riessman, 1990a)。當個人面對因長期慢性疾病造成的混亂的傳記,從敘說的過程裏,個人可以再度建構一個統整的自我(Bury, 1982; Riessman, 1990b; G. Williams, 1984)。當自我被去具體化(disembodied)時(如

進行醫學的檢驗），可以在故事中重新建構自我（Young, 1989）。

儘管言說形式似乎具有共通性，有些經驗還是很難被說出來的（Roth, 1993）。政治處境會限制某些特定的事件被敘述出來。為了避免觸犯禁忌，普遍的反應是把它們驅逐於意識之外（Herman, 1992）。政治刑求、戰爭、性犯罪的生存者會讓自己保持緘默，因為說和聽對他們來說變得太痛苦，只能選擇沉默。例如，強暴的倖存者，也許無法談他們受到恐怖侵害時所經歷到的，因為其他人無法明白這些侵害的經驗。在這樣的情況下，女性甚至明言她們的經驗都有困難。如果它被說出，過去的經驗就會浮現，如同一種「前敘說（prenarrative）：它並不隨著時間發展或前進，它也不顯露說故事者的感覺或對事件的解釋」（Herman, 1992, p.175）。社會運動幫助個人去說出她們的傷害，與其他人建立關係，參與政治行動。研究者這時也是目擊證人（關於婚姻強暴的例子，請參閱Riessman, 1992）。

個人將經驗賦予意義的主要方式，是將經驗轉換成敘說的形式（Bruner, 1990; Gee, 1985; Mishler, 1986a）。這對困苦生命的創傷和轉變格外真實：如

同 Isak Dinesen 所說：「如果我們把悲傷轉變成一個故事，那麼所有的悲傷就可以承受了。」（引自 Arendt, 1958, p.175）敘述者從無秩序的經驗裏，賦予了情節，產生了真實——「不管是自然界或者是過去，都不會有完全清晰的統整性，但是經由敘說，我們適當地超越了自然界，而進入了人類價值的範疇裏」（Cronon, 1992, p.1349）。精確地說，敘說是產生意義的基本結構。敘說必須被研究者保存下來，而不是將它變成破碎的片段。研究者必須尊重受訪者建構意義的方式，並分析它是如何完成的。

## 敘說研究

述說一位報導者故事的想法，對質性社會學家而言並不是件新鮮事，特別是那些來自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的傳統。“Jack Roller”（Shaw, 1938）和“Doc”（Whyte, 1943）是美國社會學中關於不良青少年的經典角色。他們的故事給下一代的學生說明都會的生活（基本上是男性生活；女性生活在芝加哥學派民族誌中，往往是看不見的）。

拿民族誌陳述和最近關於文本分析的取向來作比較，敘說研究到底有什麼不同呢？

在傳統民族誌研究裏，是以第一人稱視角且寫實性的描述來陳述故事，這樣只是在格式上與其他科學描述有所不同而已。雖然在寫作的修辭方式上也許因人而異（Atkinson, 1990; Richardson, 1990; Van Maanen, 1988），但它們的共同點是「期待我們關注事件本身，而不是報導者所創造出來的故事」（Rosenwald & Ochberg, 1992b, p.2），語言只是被視為一種透明（transparent）的媒介，清晰地反映出穩定、單一的意義。

實證主義實在論的假定已經受到批評，研究者開始挑戰原本對於語言和認識的觀點，這些批判為敘說研究提供了哲學的支柱。基於對真理的符合論（correspondence theory）的懷疑，語言被視為就是關於真實的深層構成，而不只是一種為了建立意義的技術性設計。報導者的故事，並不是外在世界的鏡像反射。它們是被建構出來的，是作者創作的、修辭的，且充滿了假設和解釋。

當然，在社會科學裏，文本分析有許多不同的取向，譬如，符號學（semiotics）、詮釋學（hermeneutics）、對話與言說分析（conversation and dis-

course analysis）、文件的文本取向（textual approaches to documents）。對詮釋學而言，解構的方法（deconstructive method）在美國的文學科系有如野火燎原般地廣為擴散，使得文本的客觀主義已經受到嚴重的挑戰（Fish, 1980）；在社會學和心理學，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onism）（Berger & Luckmann, 1966; Gergen, 1985）正刺激一些人用人文學科（humanities）的工具和觀點來探究語言，Greertz（1983）曾貼切地形容這產生了「模糊的文類」（blurred genres）。為了彰顯這種模糊性，Gusfield（1989）從「人文主義」趨勢的歷史發展，為社會學者定位（同時請參閱 Eagleton, 1983）。

雖然敘說學者從這些傳統得到一些啟示，但敘說取向最主要的區別在於其解釋學方面的突破。敘說分析（這裏並不只有一種方法）希望得到的是「主角是如何解釋事件的？」（Bruner 1990, p.51）我們是否可以系統地解釋他們所作的解釋。因為這個取向能夠明顯地展現出人類行動和想像，因此十分適合於那些關注於主體性（subjectivity）和認同（identity）的研究。對於那些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特徵尚未探索或不清楚的研究題目或理論，敘說研究也許並不十分恰當，但這樣的取向很適合其他的

領域，包括符號互動論和女性研究。當然，主流的社會科學對於主體性有強烈的不信任感，向來強調的是去脈絡性的法則以及類化的解釋（請參閱 Ellis & Flaherty, 1992; Hollway, 1989）。但是在個人敘說裏，「正是因為它們所具有的主體性——這些敘說牢牢地根植於時間、地點和個人經驗，無法擺脫觀點的影響——我們才會如此重視它們」（個人敘說團體，1989b, pp.263-264）。

受到社會學取向影響的研究者，敘說研究對他們來說格外有用，它們揭露了社會生活——文化透過個人的故事說出自身。我們可以檢視個別描述者所面臨的性別不平等、種族壓迫、和其他權力的運作。儘管，敘說者用看似平常的語辭來描述，但我們可以分析這些語辭如何受到文化和歷史的作用（Rosenwald & Ochberg, 1992a）。

現在討論敘說的方法論時機已經成熟，幾乎所有相關領域和專業的文獻都已經蓬勃發展了。這個範圍不再只限於文學研究，人文科學裏的「敘說的轉向」（narrative turn）已經包括了歷史（Cronon, 1992; White, 1989）、人類學和民俗學（folklore）（Behar, 1993; Rosaldo, 1989; Shuman, 1986; Young, 1987）、心理學（Bruner, 1986, 1990; Cohler, 1982;

McCabe & Peterson, 1991; Mishler, 1986a; Polkinghorne, 1988; Rosenwald & Ochberg, 1992a; Sarbin, 1986b)、社會學(Boje, 1991; Chase & Bell, 付梓中)、社會語言學(Gee, 1986, 1991; Labov, 1982; Polanyi, 1985);甚至量化研究者也正感到興趣(Greenley, 1992; Veroff, Sutherland, Chadiha 和 Ortega, 付梓中)。此外,專業工作者也採取敘說取向:法律(《法律的故事》,1989; J. b. White, 1984; P. J. Williams, 1991)、醫學(Charon, 1986, 1989; Kleinman, 1988)、護理(Sandelowski, 1991)、精神醫學和精神分析(Schafer, 1992; Slavey & McHugh, 1984; Spence, 1982)、社會工作(Laird, 1988, 付梓中)和教育(Witherell & Noddings, 1991)。專業期刊《敘說與生命史期刊》(*Journal of Narrative and Life History*)的發行,出版相關的研究報告。

## 本書的組織

這本書有三個部分。第一章提供了理論上的脈絡,主要集中在關於方法論的討論,這部分有兩個

小節。首先，我將提出一個關於經驗再呈現的問題，我把研究視為一系列的轉換，包括訴說、聆聽、轉錄、分析和閱讀。然後，我將轉向那些敘說理論的重要概念，以及這個領域當中的爭論。

第二章將呈現實際的敘說分析模式，這些模式可以關聯到第一章所提到的理論。第一個例子是一位女性的生命故事。這是由人類學家 Ginsburg 所提供的。這個例子提供了一個方向進入第二和第三個例子。後面的例子則是從社會學家（Bell 和我）所提供的。我們採用社會語言學的方法進行研究並加以發展。雖然如同之前談到的，我的位置、訓練和對理論的信念，決定了進行方式的選擇和立場。但是從這三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敘說取向裏明顯的多樣性。我對女性健康的議題特別感興趣，也真實地反映在這三個例子裏。但是我同時也珍惜「揭露」（unpacking）一個文本。明顯地，敘說分析的應用不只是在醫學社會學和女性生命的研究上面。

第三章對進行敘說研究工作提供了實際的建議，這些建議是基於前面的三個例子，同時將回到第一章的理論議題上。這本書將在結論的部分簡述目前遭遇到的兩個難題：敘說研究的效度問題和此方法的限制，包括它是否可以結合其他取向的資料

處理方式。

對這樣一本小書而言，有其限制，我無法把目前所有關於敘說的重要成果都在此呈現，特別是敘說研究涵蓋許多學術範圍和領域。為了對目前所提到的觀念能有更進一步的理解，我希望讀者可以從參考文獻中尋求其他更多的資源。

## 注 釋

- 1 文本 (text) 在當代學術論述中具有多重的意義。1992 年在麻薩諸塞州跨學科「言說分析研討會」(MIDAS) 上, Dorothy Smith 的演講讓我對此有所學習, 我使用這個字, 非常具體地是指那些可重複製造的作品 (如: 訪談的逐字稿、文章初稿、出版品)。
- 2 後者的例子, 參閱 Landau (1984) 關於演化理論、Cronon (1992) 關於歷史的敘說、和 Schafer (1992) 關於精神分析理論的討論。

## 第一章

# 理論的脈絡

---



目前有些研究者質疑我們如何能在科學工作中把生命再現出來（Lynch & Woolgar, 1990），但這也許是我們時代來臨的跡象。質性研究常企圖描寫人們的經驗，但不代表再呈現（representation）本身沒有問題，例如，女性主義強調經由描述女性群體經驗的不同，能讓沉默的她們「發聲」（giving voice）（Fonow & Cook, 1991; Gilligan, 1982; Gluck & Patai, 1991; Reinharz, 1992）。我能認同這個目標，但要更加謹慎小心。實際上，我們是無法給出聲音的，我們只能聽到那些被記錄下來和加以解釋的聲音。因此，做出如何再呈現的決定是無法避免的，研究過程的許多面向都牽涉其中，這是質性分析者（包括女性主義者）必須面對的問題。

## 經驗的再呈現

研究者無法直接進入另一個人的經驗，我們所處理的是某種模糊性質的經驗再現——包括談話、文本、互動和解釋。這是無法完全中立和客觀的，我們所能做的僅僅只是再現（相對的是解釋）其世界（Peller, 1987）。冒著過度簡化的風險，研究過

程大致上可以分成五種層級的再呈現（如圖 1-1 所示），它們之間有些部分是相互滲透的（當然，這種再呈現的危險是使這些界線過份真實，而不只是語意上的分別）<sup>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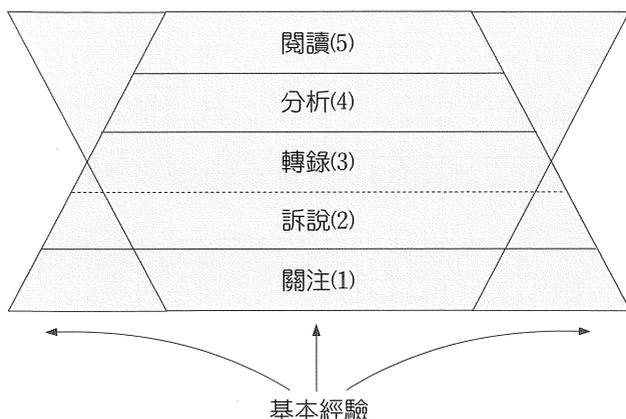


圖 1-1 研究過程中的再呈現層級

為了清楚地說明這些部分，我將拉回到解釋的問題上，而不只是抽象地討論這個圖表，並採用與傳統有些不同的歸納方式來說明我的觀點。因此，在討論這個圖表的時候，我將使用最近到南印度旅行時的一個經驗故事，來參照著說明。

為了研究不孕症所帶來的意義與因應方式，我

到印度進行田野工作的安排。為了在看似無窮的火車旅程中獲得一些休息，我在 Kerala 省的一個熱帶休憩區停留了一些日子，會晤有可能的合作者，並處理與研究相關的事務。某個清晨，我從飯店外出散步，沿著一個無人的沙灘走著。

如果我們採用現象學（phenomenology）<sup>2</sup> 的觀點出發，來思考每天片刻經驗所棲息的存在世界，我所寓居的這個海灘，其世界將是「在反思開始之前『就已存在』，如同一個不可異化的存在（inalienable presence）」（Merleau-Ponty, 1962/1989, p vii）。行走在黎明時刻，在經驗的前語言範疇裏，我所遭逢的——意象、交織的光影與色彩、浮動的聲響、轉眼即逝的感覺——都呈現在川流不息的意識裏，我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這時，我無法區辨我身體的感覺，以及我意識所構成的這個沙灘。就像所有的社會行動者，我是以一種「自然的態度」（natural attitude）來經驗這個世界，並視之為理所當然，而不是去思考它或分析它（Husserl, 1939/1973; Schutz, 1932/1967）。

## 關注經驗 (attending to experience)

然後，我在意識流裏關注傾聽，並分離出某些形貌——反思、回憶、從觀看裏拼湊。我環視這個沙灘（比擬地說），區別出某些特定的意象，以某種社群的語言加以認識——陽光、沙子、海浪、捕魚工作，在這個特定的時刻裏，漁夫的吆喝聲是我關注的對象，不是海浪拍打岸邊時的鹹味，也不是海水的感覺，而這個部分是我昨日的回憶。我停了下來，細細地觀看。男人拉動著巨大的網，他們彼此的協調地運動著，並伴隨著有韻律的吆喝聲。最後，包著頭布的男人把魚賣給穿著 saris\*的女人，女人們則頭頂著裝滿著魚的籃子走向市場。經由關注，我使某些現象具有了意義，也就是圖 1—1 再呈現的第一個層級 3。

當我在關注時是有所選擇的，我在未經反思的整體（基本的經驗）裏作了選取。例如，聽覺和視覺的真實較觸覺和嗅覺更占優勢。因為理論上的興趣及價值，捕魚工作中的性別特色吸引了我。在再

---

\*譯者註：印度婦女的傳統服飾。

呈現的第一個層級裏，藉由思考，我以新的方式主動地建構了真實。

### 訴說經驗 (telling about experience)

下一個階段就是訴說 (telling)，即個人敘說的展現。當我從印度回到美國後，在某個晚餐時刻，我將散步的經驗說給朋友聽——遇到漁夫、他們的吆喝聲、女人、以及我的驚嘆。我在對話裏把這些事件再度呈現給這些聽者，並在某個程度上加以條理化，雖然這個散步的經驗是數個星期前發生在另外一個大陸上的事，但是我就好像是在描述著自己內在的一個經驗，在對話裏我將行動演出。我的陳述是一個關於發生了什麼的故事：我談到早上去散步、還沒有吃早餐就外出、看到了漁夫、當女人帶著空的籃子來時我看著她們、我沉迷於勞力的分工和女性經濟的自足（在印度，女人基本上是被認為是卑屈的）。我描述那時的環境、角色、開展的情節，用一種觀點縫補著故事，以使我對這些事情的解釋變得清晰。為了捕捉這個特定清晨的時刻，我花了很大的篇幅來描述陽光、男人們頭巾的顏色和女人的 saris，把這些事物從海灘的真實世界，帶到

麻薩諸塞州劍橋市 (Cambridge, MA) 我朋友客廳的敘說空間裏。我的加油添醋是汲取於我的文化脈絡資源，特別是所有對話的參與者都重視的分析架構——勞動的性別分工。我的朋友傾聽著、質問著，懇求我再多說一些有關於男女交易的特別面向。我依序地重新形成事件，以回應他們的線索，為了讓這些情景的重要性對他們而言更加真實，我擴大了參考的脈絡，談到了我在印度居住和工作的這段時間，對於我的生命計畫所具有的意義。藉由說和聽，我們共同產生了一個敘說（圖 1-1 的第二個層級）。

在說的過程裏，我所擁有的經驗和傳遞的經驗之間具有一個無法避免的縫隙。用尼采的話來形容就是一個「語言的牢房」(prison house of language) (引自 Jameson, 1972)，語言是無法穿越到我言語所想指涉的想法上，因為語言「除了自己本身之外，無法傳遞任何事物」(Merleau-Ponty, 1962/1989, p.188)。同時，沒有話語、聲音、活動，海灘經驗的圖象也就中止了存在。是語言使它們成為真實；同樣地，沒有了這些，漁業的性別活動也無法存在。就如 Merleau-Ponty 所言：

我們的語言能力使我們往下進入到我們基本知覺和情感的經驗範疇裏，找尋一個真實，是容易受到言詞理解所影響，而且這個企圖向前引出了一個意義性解釋，來說明這個基本層次中的我們經驗，……從經驗中尋找意義，然後以話語來表達這些意義，說者讓所有的人共同思考這個經驗，而不只是生活於其中而已。（引自 Polkinghorne, 1988, pp.29-30）

意義有時也會以其他方式而有所改變，因為它是在互動過程的第二個層級裏建構出來的。這個故事說給特定的人聽，如果聽眾是其他的人，可能會有不同的版本。在這個情況下，我不是在中立的處境下呈現這些經驗，而是處在與一位亦師亦友的人和他的伴侶進行的特殊對談，他們對我而言具有特定的意義。在訴說這個經驗時，我也在創造一個自我（self）——我想如何被他們認識。在開始這個新的研究計畫時，我的朋友曾向我提出了幾個問題，促使我去面對這些難題，包括我的位置是擁有某種特權的、白人、西方女性來研究南亞的女性健康問題。我對海灘情景的敘說被這個脈絡沾染上特定的顏色。就像所有的社會行動者一樣，我企圖說服自

己和其他人，我是一個好人。因此，我的敘說不可避免地就是一種自我的再呈現（Goffman, 1959）。

### 轉錄經驗（transcribing experience）

如果我的每個朋友都像社會科學研究者般，他們將會把這段對話用錄音機錄下來。當然，通常錄音要比錄影具選擇性。但不管使用何種方式都無法捕捉完整的對話，因為不管使用哪種錄製形式，最後都必須以某種文本呈現它。用 Ricoeur 的話來說，這是一種將行動「固著」（fixation）以為一種書寫的文字（引自 Packer & Addison, 1989）。轉錄的過程（圖 1-1 的第三個層級的再呈現）就如同前面的層級一樣，是不完整的、部分的和具有選擇性的。

一位早期的當代女性運動者——Millett（1971），對錄音機作了評論<sup>4</sup>：

如果沒有這個機器來保留語言的真實聲音，我們可能無法知道實際上人們是如何說的：他們的停頓、抑揚頓挫、強調的部分、未完成的句子、短的結尾。所有模倣那些口頭語言的企圖都似乎過於矯揉造作，我不得不尊敬起 Ger-

trude Stein\*的極為沉靜，和佩服她是如何小心地處於聆聽狀態。（p.32）

Millett 討論了當她和性產業的女性從業者（娼妓）進行訪談，要把錄音帶上的部分，轉錄成文字稿所遇到的問題：

當聽到四個女性用英文所說出來的，我嘗試當下去捕捉其中的特色，並用錄音機進行錄音。那時，我被這些話的精采所震服，可是當我把這些談話轉錄在紙上時，最初的結果讓我十分失望。M的某些話語中關於黑人和南方式的機敏風格，隨著聲音特色的喪失同時消散……J因為把一些痛苦的事壓抑在心裏好幾年，以至於在談論這些事時有很大的困難。在她的這卷錄音帶上，我經常代言，希望能給她支持，最後在進行編輯整理時，再把我的部分去除。（p. 31）

關於 Millett 把她自己部分排除的解決方法是，「大

---

\*譯者註：美國的一位文學作者，1874-1946。

量的工作將所說的話轉換成直線條列式的語言（linear-language）」（p.32），或者採用一個鬆散的口語敘說，並把這位女性所說的加以摘要。為了尊重這四位女性不同的聲音，是以一個多重聲音的文本呈現。最後她在書寫的文本裏，用了四行來展現四個女性的談話：就像一個四重奏的樂譜，不同的聲音「是以不同的樂器來表達她們互異的經驗」（p.33）。

二十年後，我這個研究者希望「捕捉」關於海灘經驗，正面臨到與她相似的問題。但在這段期間，關於執行轉錄時較好的處理方式已經出現。把說的語言轉換成文字文本這個過程，現在已經被認真地加以考量了，因為深思的研究者不再假定語言具有透明性（transparency）。質性研究者現在會質問自己轉錄的過程應該多詳盡？例如，如何才能最佳地捕捉到我所說漁人吆喝聲的節奏？轉錄時是否應該包括沉默、搶話、強調的部分、語氣用詞像「嗯」、言說的標記像「你知道……」或「所以呢」、重讀的話、和聽者加入到敘說裏的其他部分？我們是否應該給同樣子句不同行，並且用圈線表現出韻律的結構和韻腳？這不只是技術上的問題，何者應被包括和如何安排及呈現文本，這些看

起來似乎是不重要，但是這些選擇及安排，都會影響到一個讀者將會如何理解這個敘說。

沒有所謂的口語語言的真實再呈現。Mishler (1991b) 以攝影作為類比。一般相信所謂的「圖象真實」(picture reality)，然而鏡頭、底片、沖印紙、暗房操作等這些技術的過程，使得相同物體的影像可能產生非常大的不同。再呈現的形式反映了一位藝術家的觀點和概念——強調何者是重要的。攝影師就像是研究者(轉錄者)，藉由拒絕了觀看者(讀者)的訊息，將圖像的本質固定下來。矛盾的是，他們為我們提供了空間，由我們自己來填補。雖然我們對它們知道很少，但是經由分析這些圖像(或談話)，我們可以建構一個完整的世界。因此，我對我的故事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

轉錄言說(discourse)就像照片的真實，是個解釋性的過程。決定要如何登錄，就像是決定要如何訴說與傾聽，這個過程是受到理論的導引<sup>5</sup>(Ochs, 1979)，而且是修辭的。以特定的方式來呈現文本，我們為自己的論點提供了背景，就像一個攝影師用鏡頭和影像修飾來引導觀看者的眼睛。不同的轉錄慣例會引發及支持了不同的解釋與意識型態的立場，創造了不同的世界。對於同一段談話若用不

同的轉錄方式，將會是以不同的方式建構其意義。

## 分析經驗 (analyzing experience)

圖 1-1 再呈現的第四個層級，是研究者仔細地對訪談逐字稿或謄本 (transcript) (有時是許多的謄本) 進行分析<sup>6</sup>。也許研究的議題是，如何定義啟發工作認同的關鍵時刻。如同我在海灘散步時刻的情形。也許，其他的社會科學家也會把他們研究工作的轉捩點或主顯節 (epiphanies) 加以敘事化 (Denzin, 1988)。而分析工作的挑戰就是要辨別出這些時刻的相似性，並形成一種總結與摘要。一個研究者往往要與許多頁的錄音帶的故事為伍，要把這一系列的談話加以剪裁，使它合於一個報告或書面的內容，並試圖理解其意義以及創造戲劇性的張力。形式、次序、呈現的風格、如何安插訪談中所得到的生命片段，都涉及決策的過程。對於作品的預期性反應，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哪些內容將被涵蓋，哪些則被排除<sup>7</sup>。最後，分析者創造一個後設故事 (metastory)，說明發生了什麼事。藉由訴說訪談故事的意涵，將被說出來的加以編輯和賦予新的型態，以及將它轉變成一個混合性的故事，成為

一個「虛構的文件」(false document) (Behar, 1993)。價值、政治立場、理論信仰再次產生了作用。雖然在某個程度上來說，這是種出賣——海灘故事和其他類似的故事都在另一種陌生的話語中再度誕生——但這卻是必須且是有建設性的。無論原本說故事的人如何厲害，從對話中產生的生命故事確實不是如同一本書、一篇文章或一篇論文，這些內容已經是寫好的 (Behar, 1993)。個人生命經驗的口述故事的走走停停方式，會以不同的方式重新拼貼及組合。

## 閱讀經驗

圖 1-1 的第五個也是最後一個再呈現的層級是——當讀者面對文字報告的時候。早期的草稿也許會在同事間流傳，他們的意見會整合到所謂的最後成品 (final product) 裏<sup>8</sup>，或者出版品也許會再回到報導者那裏，他們或許可以 (或許無法) 認出當中關於他們的經驗；以及喜歡或不喜歡他們被描述成那樣。但不管是哪一種情形，我那段關於印度經驗的原始敘說所形成的轉述，以及我在康橋市的社會科學家朋友從他們的觀點對它所進行的分析工

作，不可避免地會流傳到別人那裏，而由他們自己的角度賦予其意義。對海灘散步所作的摘要，可能帶給某些讀者一個零碎的印象，其他人可能好奇我和 Kerala 漁村的男人和女人的關係。我身為一個白種人、說英文的女人，以 Malayalam 語\*作為母語的人看來，我的出現帶來了什麼樣的意涵？在這個文本中，種族和階級是如何被描述的？從現有的文本裏，如果這不是不可能的話，就是很難去回答這些或相似的問題，因為一個讀者所擁有的只是分析者的再呈現。

每個文本都是「多重聲音 (plurivocal)，開放給多種的閱讀方式和不同的建構」(Rabinow & Sullivan, 1979/1987, p.12)。甚至對於相同的讀者而言，一個作品在不同的歷史脈絡下，可以引起相當不同的閱讀(例如，想像福樓拜 (Flaubert) 的《包法利夫人》在最近女性運動之前或者之後，會有多大的不同)。合作是不可避免地，因為讀者是此文本的一個行動者 (Bruner, 1986)。批判性的讀者會從他們對一個作品的解釋下，放入了對作品當中某

---

\*譯者註：通行於印度西南部 Malabar 海岸的一種語言，屬於德拉威語系之一。

些「成分」(makings)的理解，因為一個作者不可能訴說所有的部分(那些看似不相關的個人和歷史情況已被排除了)。作者透過假定這是客觀的文本，把解釋集中在權力和歷史是如何在進行的。當讀者移去了我們再呈現時那些看似穩固的立場，他們將喚起相關的歷史事件，以及受到排除的觀點——如女性、有色人種、非西方觀點。文字的文本是在某個特定傳統下完成，且對象是某些特定的觀眾。這些脈絡可以帶到讀者面前，透過讀者加以闡述。這個觀點認為所有的文本都位在一個移動的地基上，將不會有一個主要的(固定的)敘說(Clifford, 1986; Clifford & Marcus, 1986; Sosnoski, 1991)。

最終，誰真正著作了一個文本變得不清楚了，雖然西方的文本上面通常寫有個別作者的姓名，但一個文本的意義總是對於某些人才具有意義。我們所建構的真實「對特定歷史情境下的某個特別的解釋群體才具有真實的意義」(Clifford, 1988, p. 112)。對於一個文化、心理過程、或社會結構的描述，這些發現是存在於歷史的時間裏，處於權力關係的對象之間。雖然，傳統社會科學宣稱可以再現某個文化和群體的經驗，新的批評主義卻讓我們有

理由相信，最終我們還是無法對其他人說，這是最後的說法。因為我們的對象「無法靜止不動地被描繪」（Clifford, 1986, p.10；同時請參閱 Wolf（1992）關於女性主義者曾經作出相似的后現代主張）。

## 再呈現的限制

從我海灘散步的經驗，和其不斷重複地轉換，對於研究工作具有啟示性的作用。經驗再呈現的所有形式都是有限的描繪。簡單來說，在每個時機我們都在解釋和創造文本，讓符號能夠代表那些我們無法直接到達的基本經驗（primary experience）。意義本身是模糊的，因為它出現於人們互動過程之中——即自我、說者、聽者，與錄音者、分析者以及讀者。雖然最初的目的也許是要說出所有的真實，但是我們敘說他人的故事時，我們的敘說是我們世界的產物。「不可能不從某個角度出發的觀點」（Nagel, 1986），過去在此時此地說出可能對現在或未來有某種意義。因為意義是流動且具脈絡性的，它不是固定的及普世的。我們所能作的只是談話和文本，它們是部分地、選擇性、不完整地呈現了真實。

在圖 1-1 的每個層級，牽涉到增添的部分，但同時也有捨去的部分：訴說者從「整體」經驗只選擇某些特色來敘述，但同時也增加了其他的解釋元素。相似的過程也發生於轉錄、分析和閱讀之中。將研究歷程的討論架構著重在「再呈現」（representation），而非「階段」（stages）或「觀點」（perspectives）上，強調了我們主動的選擇，可以讓那些部分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呈現<sup>10</sup>。明顯地，對於個人經驗組合成的敘說而言，訴說者的力量是很重要的，但是其他人的行動（聽者、轉錄者、分析者和讀者）也同樣的重要。

再呈現的觀念為社會科學工作的性質帶來了建構的觀點，Said（1979）更進一步，使他的想法為所有研究者帶來了支持：

實在（The real）的議題是，是否確實有一個對於任何事物而言，所謂真實的再呈現，無論是單一或所有的再呈現，他們首先都嵌於語言當中，然後嵌於文化、制度和呈現者模糊的政治氛圍中。如果後者的說法是對的（就如同我所相信的），我們必須準備接受這個事實——再呈現基本上就與許多「真實」之外的東西牽

連、糾結、嵌入、編織在一起，真實，它本身  
就是一種再呈現。（pp.272-273）

不管我們是否要接受極端的相對主義，覺察到再呈現的層級，迫使我們對自己所宣稱的，更加有意識、能反思及小心謹慎。

回到讓女性經驗發聲的議題上，我準備將研究想成是聲音的合唱，它嵌入於一個對位法的二重唱裏（Gorelick, 1991）。因為大多數的研究者是擁有特權的白人，我們想了解的許多女性卻不是。這裏產生了一種緊張的關係。有些聲音必須被限制，才能聽到底層的聲音（Rollins, 1985），這才能創造出某種特殊的和諧，但是另外一個解釋者，可能選擇讓其他的聲音占有較為支配的位置<sup>11</sup>。

女性經驗的再呈現可能更加地受到限制，因為所使用的語言常常是不適當的（DeVault, 1990），對象所知覺到的世界可能受到壓迫結構所限制和組織，明顯地無法讓她們自身參與其中（Gorelick, 1991; Smith, 1987）<sup>12</sup>。如同性別的考量在女性研究中是不夠的（Riessman, 1987）。就算我們承諾站在女性立場，也未必就能讓經驗發聲。解釋經驗（這發生在圖 1-1 的所有五個層級上）牽涉到再現真

實，我們在研究的過程裏，創造並一再地重複創造聲音，這個事實再也沒有比研究個人敘說更為明顯的。

## 敘說視爲一種再呈現

現在我將更仔細地檢視，訴說/轉錄/分析這幾個層級在敘說理論所被討論的部分。相關的文獻有很多，而我進到這個領域是經由其他人為我開啟的路徑，特別是 Langellier (1989)、Martin (1986) 和 Mishler (1986a)。敘說的理論並沒有一個固定具約束力的理論，反而彼此在概念上有很大的差異。在這裏，我的目的只在於確認重要概念、爭論和解釋的困境，特別是任何人在研究第一人稱的經驗陳述時，必須要考慮的部分，並提供一些可汲取的資源。在第二、三章討論敘說研究的例子，以及從事這樣的研究的一些細節時，我將更清楚地說明我自己的立場。

## 什麼是敘說？

對於敘說的精確定義，目前還有很大的分歧。在某些人當中，其定義顯得過度地擴張，好像包含了任何的事情。例如，在臨床的研究裏，它可能被當作是關於病情的敘說、生命故事、和在精神治療時談到關於過去的敘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動人的敘說也許會成為訴說某種生命的隱喻，往往缺乏系統性的分析方法和詳細的轉錄過程。然而敘說的定義對於另一群人就較受限制，Labov（1972）特別認為，所有的敘說都是關於過去某件特定事情的故事，它們有共同的特質（如下所述）。大多數的學者把敘說當作是分離的單位，有清楚的開始和結束，可從圍繞的言說（discourse）中分離出來，而非只是情境中的事件。

在《詩論》（*Poetics*）裏，Aristotle（亞里斯多德）曾說，一個敘說有起始、中段和結束。從那時到現在，對敘說而言，學者們都同意，就算沒其他的部分，次序（sequence）是不可缺少的（詳見 Cronon, 1992; Polanyi, 1985）。Labov 和 Waletzky（1967）主張故事遵循一個編年式的次序（chron-

logical sequence)：事件的順序按照線性時間的方式移動，「沒有改變原本語意解釋中事件被推論出來的次序，事件的順序是不能改變的」(p.21)，按照這個定義，一個敘說總是在回答這個問題——「然後，後來發生了什麼？」基於 Labov 的取向，西方對於時間的假設更向前一步，Young (1987) 主張後結果式的次序 (consequential sequencing)：一個事件在敘說中導致了另一個事件，其中之間的聯結未必總是編年式的 (同時參閱 Culler, 1980)。然而，又有其他人主張主題式的次序 (thematic sequencing)：一個情節式的敘說被主題 (theme) 所縫串在一起，而較不是以時間為主 (Michaels, 1981)。西方、白人、中產階級的訪談者似乎期盼時間性次序的情節，對於用單元故事 (episodic) 式所組織的情節，似乎較難聆聽 (Riessman, 1987)。

在對話時，訴說者有時讓聽者知道一個故事是如何來的，並指出它何時結束，這是種具有入口和出口的談話 (Jefferson, 1979)。「很久，很久以前」和「他們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就是民間故事裏固定設計的典型例子。但是研究訪談中所說的故事很少有清楚的界線，界定它們常常是一個複雜的解釋過程。我們選擇開始和結束某個敘說的

位置，可以深深地改變這個敘說的輪廓和意義<sup>13</sup>，這些決定影響了傾聽者／解釋者的互動涉入這個文本的程度有多深。

並不是訪談中所有的敘說都是語言學所謂的故事。個人在描述經驗時，使用了多種的敘說文類（*narrative genres*）（*Riessman, 1991*）。藉由持續性的特定慣例元素的使用，我們可辨認出一種文類（*Mitchell, 1990*），而我們對這些元素採用的方式相當的不同。例如，當我們聽故事時，我們期盼有主角、挑戰性的情境、高潮事件，但是並不是所有的敘說（或生命）都是這種形式。其他有些的文類包括了習慣式敘說（*habitual narratives*）（當事件一再重複地發生，結果在行動上卻沒有高潮）、假設式敘說（*hypothetical narratives*）（描述沒有實際發生的事件）、主題式敘說（*topic-centered narratives*）（把與主題相關的過去事件，簡略地描述）。敘說的文類有特殊的類型和結構，它們是訴說者所選擇的再呈現方式（當然，用以符合聽者的期待），就如同電影製作人的決定，是基於他們的意圖和市場的需要，這些決定了劇本將會採用什麼形式，人物和行動的呈現會採用什麼樣的慣例。不同的文類說服的程度不同，它們使我們關心的部分

是，敘說文類與訴說者想把我們拉到他們觀點的程度（Riessman, 1991）。

### 敘說的結構 (narrative structures)

就像數股結合的強力鎖鏈，個人敘說依靠特定的結構把它們維繫在一起。雖然故事的元素可能以對比的方式放在一起，以及其結果可能指向不同的解釋，但是對話中所說出來的故事往往擁有共同的元素，而事件的意義往往是因為他們在敘說中不同的位置所致。

Labov (1972, 1982; Labov & Waletzky, 1967) 的結構取向是個典範：大多數的研究者也引用它、應用它、或使用它作為出發點 (Langellier, 1989)。他主張敘說具有形式上的特徵，每一個部分都有其功能。一個「完整形式」(fully formed) 的敘說包括六個共同的元素：摘要 (an abstract) (總結敘說的內容)、狀態 (orientation) (時間、地點、情境、參與者)、複雜的行動 (complicating action) (事件的次序)、評價 (evaluation) (行動的重要性和意義、敘說者的態度)、解決方式 (resolution) (最後發生了什麼事)、結局 (coda) (回到對現

在的展望)。有了這些結構，訴說者可以從基本經驗裏建構出一個故事，並在語句中和評價裏，解釋事件的重要性。使用 Labov 的結構類別來分析一個老師/父母的故事，Attanucci (1991) 顯示了他所描述的道德兩難可能具有的多重解釋。比如，公平正義與關懷這種關於道德困境的二分法架構 (Gilligan, 1982; Brown, Tappan, Gilligan, Miller, & Argyris, 1989)，但卻忽略了語言的模糊性質，而用對結構的關注來加以取代。

Burke (1945) 展現了分析語言的經典方法 (劇本主義 (dramatism))。他提供了另一種結構取向，可以應用到不同形式的敘說上，包括故事。個人說的動人傳說，所會運用到的文法資源將包含於下列五個部分之中：行動 (act)、場景 (scene)、行動者 (agent)、行動方式 (agency)、目的 (purpose)。「任何有關動機的完整陳述，都將提供對下列這五個問題某種程度的回答：做了什麼 (行動)、在什麼時間或地點做的 (場景)、誰做的 (行動者)、他 (她) 如何做的 (行動方式)、為什麼 (目的)。」 (Burke, 1945, p.xv) 夫妻對婚姻中暴力事件的訴說，也可以使用 Burke 的文法，可以理解彼此相對的陳述。Hydèn (1992) 顯示了男

性施暴者喜歡強調目的性的字眼（他這樣做的理由），而太太則強調行動方式（他是如何毆打她的），以及行動所帶來的影響，包括身體上的和情緒上的。Hydèn 描述了這些用語上的不同，以擴大婚姻暴力中關於性別社會建構的主題。

然而，還有另一種結構取向是由 Gee 所提出來的（1986）。他關注於一個故事是如何被說的。拉回到社會語言學中，重視口語而非文字文本的傳統。他分析了語調的改變、停頓、以及其他標點話語的特徵，這些部分讓解釋者同時聽到整段（許多行次）的談話。他使用詩的單位——詩段（*stanzas*）和詩節（*strophes*），來探究一個患有精神分裂症住院婦女的談話，顯示了她的談話是如何組織的、前後的條理、如何被理解的（Gee, 1991）<sup>14</sup>。

### 訴說的形式：脈絡和意義

形成敘說的不只關於我們過去的行動，同時也包括個人是如何理解這些行動——也就是意義。情節因為形式而有所不同：悲劇（*tragedy*）、喜劇（*comedy*）、羅曼史（*romance*）、諷刺劇（*satire*）（H. White, 1973），訴說者把他們的生命澆灌

到這些典型的形式裏。

敘說者透過他們所選擇的敘述形式，顯示那些需要被解釋的用詞。有時候，那些長時間沉默後輕聲細語所說出來的，和沒有停止、並大聲說出來的，縱使所用的話語是相同，但在意義上也有所不同。訴說者使用拉長的母音、加強語氣、語調、重複和其他的方式，顯示出什麼是重要的。情緒也同時承載於上述所說的，以及其他的聲音特性裏。雖然我們需要更多的研究，來說明情感是如何進入一個敘說的，但如果忽略了說話的特性，轉錄的形式將失去許多重要的訊息。

Labov (1972, 1982; Labov & Waletzky, 1967) 的結構提供了另一種方式，進入關於意義的解釋。敘說者在評價的句子 (evaluation clauses) (敘說的靈魂) 上，表示他們希望如何被了解，以及重點是什麼。每個好的敘說者都會嘗試避免隱含的指責——這只是一個沒重點的故事，以避免有這樣的問題產生：「這又如何？」基本上，敘說充滿了這類的評量句子，訴說者針對逐漸開展的行動退一步思考，訴說他 (她) 選擇如何去解釋這個行動 (同時參閱 Culler, 1980; Toolan, 1988)。Attanucci (1991) 呈現了有與沒有評量性句子的道德困境的故事，他展

示了在解釋上的轉變：「評量將價值和意義注入於敘說當中」（p.323）。要觸及到這些或其他承載意義的結構，要看我們（作為分析者）是如何從談話中創造了文本：經由比對那些可進行結構分析的評價子句，從連續性的句子中再現整個談話（圖 1-1 的第三層級）。

對於上面的看法，敘說理論家可能會不表同意，因為在進行敘說分析（第四層級）時，訪談脈絡（第二層級）被忽略掉了。Labov 的模式並不考慮訴說者和聽者的關係：「他的假定是，敘說是一種句子之間的關係，而不是參與者互動的過程」（Langellier, 1989, p.248）。另一個極端是「個人敘說團體」（Personal Narratives Group）（1989b），他們檢視了個人敘說產出時的權力關係：誰問的問題，以及其目的為何？有些敘說分析者（如下面所談到的）會把訪談者的位置也帶入分析裏面，這可以透過放入他（她）的導引性問題、非正式詞彙的表達、以及關於困惑和理解時的其他徵候（Paget, 1983），這些部分可以顯示意義是如何在互動過程中被完成的。Labov 逃避了這樣的質問——「是否一個故事的說出，基本上只是為了報告出事件的順序，或是為了說出一個可說的故事」（Culler, 1980,

p.36)。當我們把說故事看作是一種表演（Goffman, 1974; Toolan, 1988），訴說者面對一個基本的問題就是：如何使不在場的聽者相信有些重要的事發生了。例如：在離婚故事裏，個人訴說他們婚姻發生問題的時刻，經由修辭符號表達的有效形式，讓人們信服——這個過程是與聽者一起合作，技巧地建構了他們的故事——離婚的決定是有理由的（Riessman, 1990a）。就如同 Burke（1950）所說，語言「不僅是種描述……不只是嘗試告訴人們事件是如何發生的……它企圖感動人們」（p.41）。

分析起來，語言具有三種不同但互相依賴的功能（Halliday, 1973），這對所有的意義解釋都是很基本的。理念的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表達了所說的部分具有的參考性意義：「關於說者經驗的內容，以及其語言的社群」（p.37）；人際間的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重視訴說者彼此之間的角色關係，這種關係允許社會和個人關係經由談話而表達出來；文本的功能（textual function）與結構有關，一個文本的部分如何在造句法（syntactical）和語意上（sematical）加以聯結。意義在這三個層級都會進行傳遞，雖然理念的功能傾向於主宰溝通，既關於人們、情境的訊息內容，以及訴說者在他們

話語中所要傳達的想法。但是，個人說的意義不僅是它的內容——理念（ideational）而已，在訴說者及聽者角色之互換的脈絡（人際的）上，事情是如何被說的（文本的），這個部分也是非常的重要。敘說分析便是提供了探究聯結這三種意義層級的方法。

當然，更大的社會脈絡也是很重要的。雖然學者對它們所包含的範圍，在認知上有些不同。其中一種極端是對話分析者（在他們談話的樣本裏，很少放入像一個完整敘說那麼長的事情），他們的焦點限制在一個特定的互動裏，參與者所說和所做的。但對於「個人敘說團體」（1989b）而言，脈絡是多重層次的，這牽涉到訴說當下的歷史時刻、敘說者賴以生存的種族、階級和性別系統，他們的訴說必須在這些層級內加以解釋。我偏好的立場較屬於後者，例如，離婚敘說不太可能不參考社會論述和政治進行解釋，特別是最近一百五十年來婚姻和性別關係上的轉變。女性和男性在敘說裏讓他們的離婚變得可理解，而在這些敘說裏包含了二十世紀末美國人婚姻互動關係的假定。這樣的文本是無法獨立於它的脈絡之外的。

## 敘說的真實 (narrative truths)

最後，我碰到了一個關於敘說研究的棘手問題：訴說者所說的真實問題。早先關於再呈現和圖 1-1 的討論時曾提出，這個議題是如何複雜且令人苦惱。我們無法如同實證主義的方法，依賴於描述實在論 (descriptive realism) 的立場或外在效標。Sarbin (1986a) 稱敘說是一個基本隱喻 (root metaphor)：

這是關於單元故事 (episodes)、行動和行動陳述如何被組織的方式；這算是一個成就，將平凡的事實和幻想的創造合併於一處，而時間和地點都整合在一起。敘說允許包含行動者行為的理由，同時也包括所發生之事的原因。

(p.9)

實務上，敘說分析對真實的議題有不同的取徑。有些人認為語言再現了真實：在某種程度上，敘說的語句如同原本事件般概括地重述了經驗 (Labov & Waletzky, 1967)；其他的人則受到現象學的影響

響，所採取的立場是——敘說建構了真實：在意識流裏，我們從訴說的過程裏才獲致了真實的現象（參閱 Young, 1987, pp.186-210）；還有些其他的人，對於語言說服力的面向較有興趣，認為敘說者把他們的意識型態和利益放入了他們的故事裏（回顧請參閱 Langellier, 1989）。例如，Veroff 等人最近訪問了一些新婚夫婦，發現丈夫和妻子呈現給聽者的是虛構的敘說。而這些虛構的故事反過來「也許對演出一個快樂或不快樂的婚姻生活是個鼓勵」（p. 9）。

「個人敘說團體」（1989a）以另一種方式描述了真實，這回應了我的基本立場：

當談論到他們的生命時，人們有時候會說謊、忘記許多事、過份誇大、變得糊塗、搞錯了一些事。但是它們正在揭露著真實，這些真實並不是揭露「實際上」的過去，即採取一個完全客觀的立場。它們所帶給我們的是我們經驗的真實……這些不像科學典型的真理，個人敘說的真實既不是等待證明的，也不是自我證成的（self-evident）。我們只有經過解釋，很細心地注意那些形成他們故事脈絡，以及灌注於當

中的世界觀，我們才開始明白這些經驗。有時，我們從個人敘說裏所看到的真實，會震撼我們脫離自以為是的安全感，而這些真實，讓我們突然意識到我們自己在這個世界的位置，如同置身事外也在我們的解釋裏扮演了部分角色，型塑了我們從它們所得到的意義。（p. 261）

敘說是解釋性的，反過來也需要被解釋：它們並不會「為自己發聲」，或是「為其他時代、地域、或文化提供的直接接觸通道」（p.264）。我們的分析性解釋是部分的、相對真實的，其目標是朝向「可信度（believability）（而不是確實性），即朝向增加理解，而非控制」（Stivers, 1993, p.424）。我在結論時，將回到關於效度的議題。

剛剛關於敘說研究爭論的總結，為未來的討論提供了重要背景。我談到許多相關的面向——敘說的定義，對結構、意義和脈絡的關注——而在討論的同時，我所採取的是一種解釋性的觀點。

## 注 釋

- 1 圖 1-1 採用的是捷思 (heuristic) 的方式，對於我的主張來說，這並不是一個非常完美的視覺再呈現。因此，在每個層級上，原本的意思或多或少地可有了一些增減。一位學生曾建議我，用螺旋型來描述這個過程，而不是一系列的階段。有一位編者也曾建議，這個圖應有第六個層級——重讀 (rereading)，在討論《包法利夫人》時，我所構思的正是這個有趣的想法。然而，視覺的再呈現最終總是不完整的、部分的、有限制的 (Lynch & Woolgar, 1990)。
- 2 現象學並不是一個完全統一的哲學領域。基本上，我所汲取的是 Husserl (胡賽爾)、Schutz (舒茲)、Merleau-Ponty (梅洛龐蒂) 的部分，但我無法在這裏呈現這個運動的差異及區分，詳情請參閱 Stewart 和 Mickunas (1990)。
- 3 基本經驗裏是否有原始的意義，是 Schutz 和 Merleau-Ponty 之間最主要的差異點。另外，學者們之

間也在爭議，語言是否為意象之外的補足（經由文字來看到被指涉的對象），或者語言不可分離於知覺、意義、社會實踐之外。經驗全然是語言的人工產品，是後面觀點的極端陳述，但這並不是我在這本書裏的立場。回顧敘說作品裏關於語言、實在、意義的各種立場，請參閱 Polkinghorne（1988, pp.23-32）。

- 4 我感謝 Susan Bell 將我的關注帶領到 Millett（1971）的相關研究上，以討論轉錄的實務工作。
- 5 理論並不只是學術的建構，我現在所使用的詞彙，正如現象學者如 Schutz（1932/1967），以及女性主義如 Smith（1987）與 Sosnoski（1991）所主張的：知識可以從人們每天生活裏的平常思維裏面發現。
- 6 如上所述，轉錄總是一種解釋。參閱 Mishler（1991a）。
- 7 在田野工作中，限制是來自當地的政治機構，「在談論某些特定人士時，用新的方式來限定什麼是可以或不可以（特別是不可以的部分）訴說的」（Clifford & Marcus, 1986, p.9）。

- 8 早期的讀者在故事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並影響了我們所說的故事（參閱 Cronon, 1992）。
- 9 例如關於性別，Geertz（1973）關於 Balinese（巴厘島）社會的民族誌。鬥雞的描繪都只有男人的部分。Balinese 的女人和 Geertz 的太太，在他的陳述裏剛開始是被忽略的。當他解釋這個社會時，他也許有（也許沒有）把他的焦點延伸到女性身上。這是我們無法知道的，但是我們可以詢問和質疑他所選擇的樣本。
- 10 我感謝 Cheryl Hyde 啟發了我關於研究問題（再呈現）所使用的語言，這強調了研究者的選擇、研究者的行動方式。
- 11 參閱 Behar（1993），例如，女性間（研究者和研究對象）的階級和種族的裂縫，如何可以帶到分析之中，而予以深化。參閱 Hooks（1989），有關於女性主義的清楚說明。
- 12 這還有另外一個危險，特別是在性別的比較研究上，容易把從西方女性主義者思考上的類別，強加到非西方女性身上。
- 13 以歷史研究作為例子，關於北美大草原的敘說，是包括了還是排除了美國原住民。參閱 Cronon

(1992)。

14 其他研究者也已經注意到普通言說中，詩意的表述方式。（參閱 Richardson, 1992；Tannen, 1990）

## 第二章

# 實作模式

---



現在，我將回到敘說研究的實例上。有三個關心女性健康問題的研究者，使用女性第一人稱的經驗陳述作為她們研究的基本資料來源。我嘗試探究每個取向是如何對她的文本進行探究，以說明第一章有關再呈現的層級，以及敘說理論當中存在的爭論。我之所以用「民主」（democratic）的方式安排，是慎重考慮的結果，以強調敘說分析的方法並非只有單一的方法，有許多的取向都適合研究不同敘說形式的文本。不論它們之間是如何的不同（我會清楚地說明我的偏好），這些例子都顯示了敘說理論為我們所提供的根基，而我們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系統地分析個人對過去經驗的回憶。

Ginsburg 研究的是掙扎於是否要墮胎的行動者，基於情節——故事區分（plot-story distinction）的方式，她分析了認為贊成墮胎合法化（prochoice）與反對墮胎（right-to-life），這兩群不同的女性，看她們陳述當中的情節是如何地轉向的；Bell 研究的是 DES 女兒，基於 Labov 和 Mishler 的結構取向（structural approaches），她在一個個案研究裏，顯示了一個女性如何從她的缺憾中，轉化其意義，並變得積極於政治運動；我自己的研究則是離婚敘說，在這個研究裏，我使用的是 Gee 的詩意的結構

取向（poetic structural approach），研究一個有憂鬱症女性的陳述。第一個例子探究了一個生命故事的整體輪廓，第二個研究顯現了在一個單獨的訪談裏所聯結的故事；第三個研究則顯現了內嵌於個人敘說裏的詩的特性。

如果超越了方法論的問題和實質研究上的差異，這三個研究者具有一些共通性：都認同自己是女性主義者，並把女性主義的政治立場帶進解釋文本的過程裏，指出了女性經驗再呈現所會遭遇的困難。都強調女性的能動性（agency）和主體性（subjectivity）。都在更廣的理論問題上，暗示了女性為什麼以及如何地變成對政治熱衷（或者為何沒有）。

在方法論的層次上，每個例子都提出了一些關於我們在研究報告中如何再現經驗的問題：

1. 訴說如何被轉換成一個文字的文本？如何對敘說進行分割？
2. 敘說的哪些面向構成了解釋的基礎？
3. 誰來決定敘說的意義為何，以及是否可能有其他方式的文本？

子，同時也期望指出隱藏在每個報告後的方法論上的選擇，這些選擇可以反映出圖 1-1 再呈現的層級。如同 Kuhn (1962/1970) 所主張的，範例 (exemplars) 往往承載著許多的默會知識 (tacit knowledge)。

在第一個例子裏，我將集中在個人是如何訴說他們的經驗，這明顯地需要敘說的語言來達成。然而，敘說理論所設定進行的分析工作，在第一個例子裏大部分是看不到的。我之所以放入這個例子是因為，儘管它和其他兩個例子相當的不同，但它可以為未來的研究者提供延伸和擴展的重要洞見。

## 生命的故事

人類學家 Ginsburg (1989a, 1989b) 研究北達科他州 Fargo 市的三十五位女性行動者的生命。她們在許多點上都頗相似，唯有對墮胎議題的立場不同而被區分開來。Ginsburg 希望辨認是什麼區隔了那些贊成和反對的女性，她們似乎具有許多共同的個人特質、宗教信仰、和生長在傳統家庭裏。而 Ginsburg 感興趣的是，對墮胎議題的政治立場和個人在家庭

的經驗有何關聯。她把這個爭論兩邊的積極分子視為社會變遷下的行動者（agent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而她需要一種方法能夠關注於個人對自身行動的理解，以解釋她們為什麼會如此積極。她的辦法是運用「場境中的實際生命故事……以敘說的取向解釋它們」（Ginsburg, 1989a, p.ix）。她採用「故事」（story）的日常用法，但是並不假定這些女性所說的和她們實際的經驗或行為之間有絕對的關聯。而以另一種角度，她試圖探究女性是如何用故事建構了她們的立場，以及比較贊成墮胎積極分子的陳述和反對立場女性的陳述，在語言上和內容上的差異。

## 敘說方法

從深度的質性訪談中，Ginsburg 發現兩邊女性所談論的「生產故事」，主要集中在她們個人的轉變（individual transformation）時刻裏，正面臨是否要當母親的決定性關頭，而這時她也在為可獲得的資源掙扎奮鬥。故事可以把「失序的」（disorderly）經驗加以型塑（就如同敘說理論所預測的），而從這些女性的報告裏顯示，經由政治意識的根本改變，對她們的經驗也產生了觸媒作用。

膳本 2.1 展示 Ginsburg 對 Kay 生命故事的分析，這是其中一個「動人的文本」（compelling texts），它闡明了從其他贊成墮胎訪談裏所發現的一般模式（較長的版本請參閱 Ginsburg, 1989a, pp. 150-155）。為了符合生命故事法所使用的修辭慣例（Bertaux & Kohli, 1984），Ginsburg 為了呈現 Kay 生命所創造的文本，是許多部分的混合物，它包涵了訪談資料中直接引述（大部分都很簡潔）、較長談話內容的總結、Ginsburg 本人對理論議題的陳述、以及從三十五個訪談得到的重要內容主題（「就像是幾乎「所有」的女性積極分子……」\*）。Ginsburg 的作者本人的聲音和解釋性註解，將完全不同的元素編織在一起。這決定了讀者將如何理解 Kay Ballard 的經驗，這種形式的再呈現，作者擁有較強的主導權，見圖 1-1 再呈現的第四個層級（Bell, 1991）。

---

\*譯者註：膳本 2.1 第二段第三行。

## 謄本 2.1 Kay Ballard 的生命故事

在 Fargo 這裏，Kay Bellevue 是目前這個論戰當中的主要人物。她於 1981 年，開了一間墮胎的臨床診所。她生長於美國中西部，是七個小孩中的老大。父親是浸信會（Baptist）的牧師，母親則是家庭主婦，但有時也在公立學校裏兼職。作為許多贊成墮胎積極分子的範例，Kay 在敘說的開始，以她認為的個人故事做為「理由」（reasons）來說明為何她會變得與眾不同。這個故事的情節首先就顯示了這種意識的最初分化，是來自於把家庭的一個重要成員視為角色楷模，而這個經驗被她認為是後來對文化反對立場的認同來源：

我總是認為自己和其他的孩子不同。身為一名牧師的小孩，不管是真或假，我總是覺得人們期望我變得完美，期望我的行為能夠如淑女般……我的父親總是對政治上所發生的事感到興趣，特別是反戰運動和黑人人權。我是他眼裏的甜心，他總是對我所做的事感到驕傲，我的父親是一位很獨立的人，我從自己身上看到許多像他的部分。（引述 1）

在她的大學三、四年級，Kay 懷孕並且結婚了。不久後，她搬到 Denver（丹佛），她的丈夫正在那裏的英文系的研究所就讀。就像是「所有」的女性積極分子一樣，無論她們關於墮胎的立場為何，對 Kay 而言，轉換成母親這件事是充滿了矛盾的。雖然她的行為實際上並沒有那麼不同於反對墮胎的女性——身為一個年輕的母親，她做些兼差的工作，並開始參與社區組織——Kay 對她這個

時期的行動「解釋」，強調身為母親的限制。因為，她的生命情節開始對於身為和選擇做一個母親，有了許多未預期到的反應。

我很享受這種家居生活，但是我無法做到所有的時間都待在家裏。在我的生命裏，我不曾有過這樣的經驗。待在家裏和帶小孩，一年以後，我感到我的心靈變成一片廢墟，同時我們的經濟情況不好，也幾乎無法一起出外旅遊。（引述2）

相對地，那些享受生命的女性，面對相同困境時，則往往強調的是自工作場所帶來的不便。無疑地，對於兩邊的女性，有「理由」從事義工工作，是被當作是可接受和令人滿意的方式，因為它可以平衡在美國社會中工作時的結構性孤立，以及作為母親所帶來的責任和快樂。例如：La Leche 聯盟（一個推動母乳餵養和自然生產的國際性組織），贊成墮胎和反對墮胎的女性在這個團體裏有相同的機會行動。在她生命的前二十年，Kay 變得積極參與 La Leche 聯盟當地的分會，在 Kay 的例子裏，她遇到了一個女性，將女性主義介紹給她，這是故事情節的一個重要的轉捩點，賦予了這個「故事」的張力。因此，她把這當作是一個關鍵事件。

我遇到了某人，她對我說：「你應該到 La Leche 聯盟來見我，因為她們有關於生產準備的課程。你來了以後，也許會很有興趣聽聽她們所談論的。」我第一個小孩的生產經驗並不是很愉快，因此我去了那，並且真的感到好奇。然而那裏的人們談論她們的生產經驗，就好像這是你所經歷的最美好事情，而實際上我的經驗並不完全

是這樣的。我經歷了非常長的分娩之苦，我大聲地尖叫、痛苦的呻吟……我的丈夫都以為我要死了。因此，這個團體教導我一個完全不同的生產概念，因此，我第二個生產的經驗變成不同，這令我真不敢相信。（引述 3）

在第三次的懷孕期間，Kay 的意識逐漸增長，並關心女性生產上的需求如何受到醫療專業的殘害。

經歷了這些，使我成為一個女性主義者。我開始意識到，那些被認為應該是了解女性身體的醫師們，很少人真正地了解。所以我成為一個支持女性應該站起來，爭取自己權益的提倡者，開始自己餵母乳。（引述 4）

那時她所關心的事情，並沒有與那些強烈反對她的工作的鄰居或民眾有很大的不同。1972 年，因為她丈夫的工作關係，搬到 Fargo。她開始參加 La Leche 協會，並成為領導人物，同時也懷孕了。Kay 認為這是一個危機時期，她的父母親這時候離了婚，而自己的一個孩子又出了問題。

然後，我選擇了墮胎作為解脫。我最小的孩子才十八個月大，我卻意外地懷孕了。我們同時有四個小孩，而我們必須決定是否要把肚子裏的小孩，當作是家庭裏的一分子。如果我們要生存下去，我們就得忍受許多的壓力。（引述 5）

在她更公開的角色裏，當她要舉自己墮胎決定的例子時，Kay

總是把她的行動聯結到她對於道德原則和家庭關係的強烈承諾上。

我的行為總是遵照著猶太和基督教共有的原則（Judeo-Christian principles），即十誡（The Ten Commandments）和「愛汝鄰人」。我成長於一個有強烈道德感的家庭，而這依然是我的一部分。（引述 6）

我認為對她們而言，很容易把我們定型成為與她們有完全不同價值的人。但完全不是這樣。許多贊成墮胎的人和那些反對墮胎的人有著相似的價值觀。擁護尊重生命觀點的人並不了解，我是多麼地重視我自己的家庭，以及我是如何地熱衷著家庭生活，這是自從我有了四個小孩，以及在我生命早期為母乳餵哺組織工作的時候，就是如此。（引述 7）

資料來源：引自 Personal Narratives Group（1989b）。由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允許翻印。

看看我在 Ginsberg 文本裏所標記（引述 1-7）的那些訪談的引述，當中有許多典型的敘說特徵。不管訪談時訴說的次序為何，Ginsburg 根據時間的移動來對 Kay 的經驗進行再呈現（但人們實際上並不是總是從頭開始說）。她重構了這些訪談引述，

使得 Kay 的經驗可以隨著原生家庭、婚姻家庭到她現在的行動精神，這樣的順序在進行著。第一段引述是關於牧師女兒的訴說。兒童時，她看見了他的「與眾不同」，而認同了父親。下一段引述則是轉向於 Kay 的成年時期——成為一位母親，特別是成為一個全職母親的辛苦（「我的心靈變成一片廢墟」）。自我轉型的關鍵時刻在第三段引述，和一個朋友談論 La Leche 聯盟的對話，以及回顧她第一次的生產經驗。在知道生產可以是完全不同的，Kay 的意識開始有了轉變，而擴展到其他關於女性健康的議題上，特別是女性和她們的醫師關係上，這是第四段引述的部分。第五段引述則隨著時間跳躍前進（Kay 現在有了四個小孩），她進行了墮胎，以使她們能夠維持一個家庭。最後兩段引述不是關於發生的事件，而是 Kay 對於宗教和道德原則在生命裏的重要性進行評論。她說了許多與她政治立場相反的人的相似部分，如果沒有了真實或想像的他者——墮胎的反對者（「她們」\*），她的立場是無法明顯地存在的。相似與差異的雙重主題讓 Kay 的經驗，如同 Ginsburg 所呈現出來的，從頭到尾貫穿

了這個生命的故事。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Ginsburg 的分析策略和傳統民族誌取向的區別在於「次序」（sequence），她分析了訊息提供者呈現出的開展情節。以俄羅斯形式主義者（formalist）Viktor Sklovskij 所發展出來的架構來看，Ginsburg 注意到敘說中故事（story）和情節（plot）的不同。「根據西方敘說和社會慣例，一個女性傳記的期望安排」（Ginsburg, 1989b, p.64）：某個人出生，像其他小孩般地成長、結婚、變成母親等等。故事（Fabula\*）是直線的、時間次序的、或關於一個生命的因果敘說。而情節（sjuzet）則顯露於「敘說裏未預期的轉變中，它讓我們注意到與傳統故事不同的部分」（Ginsburg, 19891, p.142）：某人和其他小孩有所不同，婚前就懷孕了，懷孕並不是件很值得高興的事等等。贊成墮胎和反對墮胎的女性都可以從故事建構不同的情節，「當代的美國，女性生命的進程有不同的定義，其社會影響可以用新的形式來說明，它是可選擇的、被拒絕的、重新調整、可再生成的」（Gin-

---

\*譯者註：俄羅斯的型構主義者使用這個詞來等同於story，用 sjuzet 來等同於 plot。

sburg, 1989b, p.64)。但是，這兩群女性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在建構她們的故事情節線，Kay 說明了典型贊成墮胎者的情節線：兒童時期就有所不同（引述 1）；經歷了一個生產的過程，而質疑作為母親所受到的限制（引述 2）；在 1960 和 1970 年代接觸了女性主義，而有了轉變（引述 3 和 4）；隨後建構了對自我、女性興趣和養育的理想（引述 4-7）。

運用 Ginsburg 的方法，比較一系列第一人稱陳述的情節線，是一種分析敘說的方式，分析者探究因果次序，以找出轉折點，顯現理想和現實、文化腳本和相反敘說之間的斷裂。研究者可以採用草擬的策略（discursive strategies），來尋找樣本中的相似和相異處——即在廣義而言，故事是如何地被說出來的（例如參閱 Chase & Bell，付梓中）。從訪談資料中說明性的直接引述，可為研究者對情節轉變和與傳統故事的不同所作的解釋，提供證據。

## 問 題

回到我第一個問題，Ginsburg 如何把女性行動者的訴說轉變成文字的文本？如何決定敘說的片段呢？她並沒有討論轉錄的慣例為何，她和那些女性

行動者的對話是如何呈現？也就是圖 1-1 層級二到層級三的轉換。分析過程的這些面向，無法被看到。生命故事取向的典型作法是，把焦點放在總結 Kay 所說的大意，口語到文字語言的轉移被當作是沒有問題的。訴說是將不流暢部分的「清理」（clean up），使它容易成為可閱讀的，語言視為一種透明的媒介，主要是用來獲得經驗底層的內容。

Ginsburg (1989a) 並沒有定義她所謂的敘說為何？她曾指出「在生產的故事當中……女性使用她們的行動方針來架構和解釋她們的歷史和傳記經驗」（p.134）。在她的用法裏，生命故事和敘說是同義的。在生命故事的傳統裏，Ginsburg 和其他人共享這樣一個鬆散和廣泛的定義（Bruner, 1990; McAdams & Ochberg, 1988）。因此，整個訪談隱隱地構成了敘說。以我對敘說理論的理解來說，訪談的引述及節錄並不完全是敘說，至少她們沒有把讀者拉回過去清楚的細節裏，而只是對過去事件和行動加以總結和辯解。

Ginsburg 對於 Kay 和其他人所陳述的故事歷史的脈絡倒是相當的敏感的，但並沒有對訪談的脈絡加以注意。例如，我們不知道是怎麼樣的互動方式產生了關於 Kay 的敘說，並沒有顯示實際對話的範

例。Ginsburg (1989a) 說：「在形成敘說的時候，我的期望是干擾愈少愈好。」(p.135) 這暗示了她試圖從資料中搜尋出資訊提供者記憶幽處的先前經驗，雖然在其他的方面，她已經小心地區分故事和它所指涉的先前經驗之間的差別。

個人敘說是在對話的過程裏產生的。Kay 的敘說是特定訪談脈絡下的產物。特定聽者和訴說者在某種權力關係、在特定的歷史時刻，所進行的對話。在另外一個章節〈田野工作：對觀察者的觀察〉(Fieldwork: The Observer Observed)，Ginsburg (1989a, pp.4-6) 曾提供了重要洞見，說明她旁觀者的角色如何影響了研究的過程，但是在進行敘說分析時，她卻把自己刪除於外了。也就是圖 1-1 再呈現的第二個層級，兩個女人一起建構文本的方式，並沒有被看到<sup>2</sup>。

其次，這個敘說的什麼面向構成了解釋的基礎？Ginsburg 從整個訪談資料裏建構了她對 Kay 生命故事的解釋。然而，讀者只看到簡短的訪談引述、簡略的一瞥，或者那位女性生命的某些時刻被選擇和重新安排，用以呈現一位浸信會牧師的女兒成為贊成墮胎行動者的轉變過程。我們必須依賴作者的話語，按照她所說的生命故事順序進行理解，

因為我們無法看到其他的部分。按照這種方式，Ginsburg 對於訪談材料的使用，就如同那些傳統的質性分析者，把訪談分割成一片片的、某個反應的一部分，用來支持她所發展出來的理論。她關注於生命故事的情節轉折，但是我們並不全然明白，是什麼構成了情節的轉折。她沒有提供足夠的訊息進行結構性的分析。作者為讀者解釋了這個故事，但是卻拒絕了讓它說話的空間，和本身所具有的模糊性。

例如，我很好奇當 Kay 在第二段引述說「她的心靈變成一片廢墟」，對她而言，這是什麼意思？她可能在描述許多有小孩的母親，生活裏長期沒有刺激的感覺：她的智性浪費在全天候的母職裏；或者，「廢墟」是否具有其他的涵意。因為 Kay 在這裏所使用的語詞是不平常的，可能參考了某首詩（T. S. Eliot；詩人艾略特）或對環境的描寫（也許是 Fargo 當地的景色）；她是否指她在一個傳統家庭裏所感到的社會孤立？我發現自己必須把這些詞，適當地對應到自己先前的理解，把它合併到我的意義和生命裏（再呈現的第五層級），雖然這也許並非完全是 Kay 心裏所想的。這裏與歷史學家處理檔案資料（archival materials）不同的是，那些蒐集個人敘說的研究者可以詰問資料提供者，她們所說的到底

是什麼意思。在訪談裏所使用的語言，可以仔細地考察——加以「解開」（unpacked），而不應把它當作是透明、本身自明、不模糊的——無論是訪談過程本身以及後來的訪談謄本，都可進行進一步分析。

最後，誰來決定 Kay 的敘說具有什麼意義？這是誰的故事？為了符合民族誌寫作的規則，Ginsburg 的文本必須有說服力，即再呈現的第四個層級——她要歸納女人們所說的和其中的涵意。她選擇了特定的引述來顯示她的解釋架構，但是這個分析並沒有牢牢地扣緊於行動者陳述的目的。Ginsburg 的文本特別重視於作者的解釋，也就是把 Kay 的敘說編入 Ginsburg 的敘說，以說明歷史的變遷，雖然目的是要「從行動者的觀點來理解墮胎的爭論」（Ginsburg, 1989a, p.3），但是讀者經常受到作者解釋性聲音的引導。這是一個轉譯過的文本，一個介於中間的文類，一個調整過的生命故事（Peacock, 1992）。Kay 訴說的功能是在支持某種論點，就好像使用量化的證據，以提供事實的訊息。這樣的再呈現形式在第五層級上受到嚴重的限制——文本意義的另類解釋，因為讀者並沒有太多機會直接接近 Kay 的生命故事，嚴重地限制了對這些資料進行另

類的閱讀。

我之所以提到 Ginsburg 文本再呈現的困難所在，是因為敘說分析者必須正視它們。當然 Ginsburg 並不是出自於敘說傳統，對於語言的建構層面並不感興趣。我首先會以她的研究為例，因為這個研究容易接近且女性主義的分析也是相當重要的（當然也具爭議性）（參閱 Bennett, 1989）。Ginsburg 理論的結論是令人注目的，而我很欣賞她能將研究工作結果帶回給她的受訪者（在結論裏討論效度問題時，我將提到這所帶來的好處）。但這本書裏不只是 Kay 的故事。依我的觀點，我們應當可以從中學到更多，只是 Ginsburg 並沒有把敘說分析推得更遠。

未來的研究者可以發展和擴展這個取向。一個明顯的優點是 Ginsburg 納入了許多的個案，並且得出相關的解釋：她從相互對比的女性團體成員的生命故事中，歸納出生產經驗對她們的意義。分析不同訪談中的情節結構，是一個大有可為的取向，並且可以被其他人所採用，以研究其他生命經驗的個體所具有的多樣性。要顯示這種多樣性，不只是經由對照不同個體所選擇要強調的主題內容（如同質性分析的其他形式），而是對照個人是如何地選擇把他們的陳述組合在一起——也就是訴說的形式。

對 Ginsburg 而言，形式同時代表了生命故事中轉折點的內容，以及生命事件是如何安排生命故事的方式。其他的研究者則可以延伸這種解釋性架構，把言說（discourse）更進一步地「解開」。

有些遵循生命故事傳統的學者，的確關注於形式和語言。為了研究檔案口述歷史（archival oral histories），Yans-McLaughlin（1990）發展了四個區塊，來區別和登錄 1900 年到 1930 年之間，在紐約市，義大利和猶太移民勞動者的敘說：(1)在訪談裏，訴說者如何組織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時間；(2)訴說者描敘她（他）過去自己的方式；(3)訴說者描述或未能描述事物和人互動的方式；(4)兩組腳本的互動——分析者和訴說者。每個區塊都要仔細地注意所使用的語言。例如，關於第二個區塊，Yans-McLaughlin 比較了歷史敘述裏關於自我的主動動詞和被動動詞的造句法：“This happened to me” 和 “I did this”，比較起來，在意義上就承載了不同的世界。即使相同的受詞（如工會抗爭）也有不同的意義，同樣地也可區別主詞<sup>3</sup>。

愈來愈多的人對於生命史的取向感到興趣，特別是女性主義的研究者（Geiger, 1986; Gluck & Patai, 1991; Reinhartz, 1992）。現在的挑戰是，要找出研

究文本的方式，使得原本的敘說者不會被隱沒，她不會對她所說的話失去了控制。

## 從對談資料中聯結故事和意義

社會學家 Bell (1988) 研究 DES 女兒的敘說，以了解她們如何理解這些危險並進行反應，以及她們如何轉化自身的經驗，而在政治上變得積極。DES (diethylstilbestrol 二乙基固醇) 在女性健康史的地位是很傳奇的。從 1940 年到 1971 年間，美國有五十萬到三百萬的婦女暴露在早產的危機下，這個藥被當作是預防流產的處方藥。但是現在她們生下來的女兒卻面臨到許多有關生產方面的問題，包括不孕、流產、陰道癌和子宮癌。矛盾的是，DES 女兒「必須回到醫療系統——這是造成她們現在問題的來源——以獲取資訊和治療」(Bell, 1988, p.99)。她們與醫療機構互動的經驗裏，必須持續地應付各種危機和不確定感，因為目前尚未完全了解使用 DES 會造成的可能影響，而且醫療檢驗和處理的方式也一直在改變。

有些 DES 女兒參與了政治，並加入了 DES 行

動聯盟（DES Action）。這是一個為爭取女性健康的運動。就像 Ginsburg，Bell 特別關注這種行動主義（activism）是如何發生的，以及個人生命傳記和公共行動之間的關聯。

## 敘說方法

Bell（1988）的方式是，問一個開放式的問題，「傾聽時儘量不要有太多的干擾，試著以重複她們所說的，來回應我對 DES 女兒反應的問題和說明上……在任何的時刻都應儘可能地這樣做」（p. 100）。在訪談的時候，為了使聽者能夠明白她們經驗的意義，女性們不停地在敘說，並從訪談的各個部分來聯結她們的故事。Bell 則顯露了這些故事被聯結的方式，當這些故事被拿來一起進行分析時，將展現了個人如何改變她們對於健康問題的意識，以及如何變得積極地參與政治。她同時也顯示了意義是如何經由兩個說者之間的互動而產生。

Sarah，一位三十多歲的中產階級女性，在一個半小時的訪談過程裏，說了三個故事：關於她如何知道自己是個 DES 女兒，以及她如何把她的知識轉換到政治行動裏。這些故事原先是分離而不連續

的，把這些故事放在一起，卻串聯起 Sarah 的十二年生命，並描繪出她認同上的轉變：「Sarah 是如何改變的，從一個消極的病人變成一個積極的人，從一個孤離的個體，變成一個女性健康組織的積極參與者。」（Bell, 1988, p.109）

### 謄本 2.2 故事一：「這似乎只在我腦中輕輕掠過」

#### 摘要（Abstract）

002 L：你如何發現你是一個 DES 女兒，

003 以及那時的感覺

#### 狀態（Orientation）

006 N：大約是我十九歲的時候，

008 那時我正在唸大學

#### 複雜的行動（Complication action）

009 而我去找，找了，一個婦產科醫生做避孕

011 他是，他發現我是個 DES 女兒因為我有腺嘌呤核苷酸缺乏症

(1) \*嗯，

012 所以他，告訴，你知道，他告訴我（2.5）

016 之後我很快就想到，

\*譯者註：停頓的秒數。

017 (我的母親)想告訴我，

018 嗯我還是說：「我已經知道了」，或，(inhale\*)

解決方式和結局 (Resolution/coda)

022 那時我所關心的是避孕，

023 我有點認為這不是真的，嗯

024 它絕不會是真地，變成我生命中的重要部分

025 這似乎只在我腦中輕輕掠過 (tch\*\*) (1.5)

---

來源：Bell (1988) . Ablex Publishing Corp. 同意轉載。

在故事一（謄本 2.2）中，Bell 呈現了第一個故事的主要敘說（core narrative），針對基本情節中的某個反應作了極端的化約（Misher, 1986b）。在這裏，Sarah 訴說，當她第一次知道自己是 DES 女兒（她在大學時去作避孕），以及這段經驗所代表的意義（雖然不是非常清楚）。Labov (1972) 的轉錄方法和他結構式的類別被用來建構這個文本：句子裏呈現出敘述時的語氣、每一行被編上號碼；以及敘說的不同部分依它們的功能（狀態、實行的行動、解決方法等）來加以區別。為了把焦點集中在

---

\*譯者註：吸一口氣的速記。

\*\*譯者註：嘆氣的速記。

主要敘說上，這個言說（discourse）的其他部分就被刪除了（描述、其他的旁白、說者和聽者之間的互動、和大多數評價的句子）。雖然在後面 Bell 的分析裏，這些將是被關注的重點。話語中的其他特性仍被保留在這個敘說的再呈現裏，例如：敘說者的停頓（短的用逗號，長的就用間隔的秒數）。為了 Bell 的解釋性目的，這些細節的區分是絕對必要的。和 Ginsburg 不同的是，她有興趣的不只是敘說的內容和情節線，同時也包括了此故事是如何被說的——敘說者如何與聽者合作，以選擇的某些結構和語言，來呈現政治意識改變的經驗。

### 謄本 2.3 故事二：「從這次我開始接受這個事實」

#### 摘要

- 202 然後我遇到了一些問題，懷孕，  
203 這卻帶來了所有的 DES 問題（1.5\*），讓我的心靈更進一步  
204 使得我更加地，主動地關心這個議題，

#### 狀態

- 207 但，啊我，我的第一次懷孕，嗯，我的這些問題，都是因

\*譯者註：停頓的秒數。

為 DES

複雜的行動

- 208 我懷孕了  
224 而在某個，某個午夜的一個晚上  
225 我的羊水破了，  
226 而（1.2）你知道 Mark 趕緊把我送到醫院  
227 我生下了一個女兒，  
228 （tch\*）只活了大約八個小時  
229 但是她死了  
232 然而那時，當，醫師（1.5）（tch）那時照顧我的醫生  
234 嗯，她說，她後來想想這可能是 DES 的原因，  
235 嗯，我並不想相信她（1）  
261 然後我回家去了  
265 嗯她真她真地作了許多的研究  
266 而這些，給了我整個輪廓，說明這可能是如何發生的  
267 為什麼她認為這是和 DES 有關  
270 然後的確很可能是這樣的，

解決方法和結局

- 277 嗯（1）從這次我（1.2）嗯開始接受這個事實（1.2）  
278 你知道那時一切都明白了。

來源：Bell（1988）Ablex Publishing Corp. 同意轉載。

\*譯者註：嘆氣的速記。

如果我們注意到這個言說的細節，將發現 Sarah 第一次和第二次故事間的關聯。第二個故事（謄本 2.3）是在第一個故事之後十五分鐘說的，描述了 Sarah 在流產後，變得主動關心 DES。她不再是個探索性生活的年輕人，而是一個已婚、想要有小孩的婦女。在這個脈絡下，早期診斷的意義有了轉變，就像她被一位女性醫生所告知的態度，Sarah 開始認真地考慮認同自己是一個 DES 女兒。二個敘說中的語言，顯示了這種意識上的改變。從下面的對照當中，Sarah 生命中這兩個時期彼此聯結的關係是非常清楚的，如同 Bell（1988, p.112）所顯示的：

故事一	故事二
038 沒放在心上	203 讓我的心思更進一步
038 主動地將它排除	204 主動地關心這個議題
022 那時我所關心的是避孕	204 關心於（關於 DES 的議題）

當我們循序看著各個故事時，Sarah 用字上的重複讓每個故事更加有力量，並顯示了脈絡和 Sarah 對它的反應如何產生了變化。沒有了 Bell 轉錄的方

法，以及對於用字遣詞的仔細關注，我們無法看到意識轉變過程的證據。

### 謄本 2.4 故事三：「我無法再，對此感到自在，並說這不是我」

#### 摘要

301 L：你如何，變得積極涉入 DES 行動聯盟

#### 複雜的行動

302 N：(3.5\*) (tch\*\*) (inhale\*\*\*) 在電視或廣播上聽到了一個廣告 (1.5)

305 而我認為我，它是否他們有這個錄影帶編號

306 而我打電話過去

307 尋求相關的資訊

308 他們送我他們的小包包

309 然後我，就參加了

311 之後過了一陣子

312 他們送我一張卡片，

313 嗯他們有一個咖啡店，一個就像是你平常會去的，

314 嗯我無法去那

\*譯者註：停頓的秒數。

\*\*譯者註：嘆氣的速記。

\*\*\*譯者註：吸一口氣的速記。

322 嗯，但是我覺得有點像是我有義務去見那些人

#### 解決方法

323 然後，所以我就前往並見了他們，你知道的

324 並喜歡上了他們

325 雖然我大概（sic\*）有些是我想要更深入地參與其中

#### 結局

327 （1.5）並持續保持那樣的方式

來源：Bell（1988）Ablex Publishing Corp. 同意轉載。

在第三個故事裏，訪談的最後部分（參考謄本 2.4），Sarah 訴說她如何參加了 DES 行動聯盟，變成積極參與其中。主要的敘說有點無趣且大部分是事件，重述了 Sarah 與 DES 行動聯盟的互動過程。她從「積極關心」DES 對她的影響（故事二），轉變到告訴那些受到 DES 影響的人們，並加入與此有關的女性團體（故事三）。

把這三個故事放在一起，顯示了 DES 女兒如  
何去面對她受到 DES 影響的事實以及產生的

\*譯者註：笑聲的速記。

反應，她解釋情況是如何變化的、她對事件的知覺是如何的改變、她的適應是如何改變、這些改變與前述的關係為何、以及這些改變和她成為一名政治女性的關聯。（Bell, 1988, pp. 103-104）

為了解開這三個故事裏的迷團，Bell 必須超越這些主要敘說，因為評價的語句（evaluation）已經被排除了。例如，我們從故事二知道 Sarah 變得「接受事實」——她是一個 DES 的女兒，但是並不知道這有何意義？她意識中因此伴隨的情緒改變是什麼？Sarah 就像所有的敘說者，以修飾過的話語、重複的字或詞、或者情緒性的聲音和沉默，傳達其中的意義。雖然在分析的第一階段，化約成一個主要敘說是有用的，但是這也排除了較為完整的解釋所必須的一些重要特徵。

Bell 檢視了冗長和複雜的文本——這三個故事的完整版本，看出了 Sarah 從對 DES 的狹窄觀點，轉變到一個從社會和情緒脈絡來理解她的健康。源自於 Mishler（1984）進行醫學訪談的研究，她分析了 Sarah 陳述當中，生活世界的聲音與醫學的聲音之間的對話。這兩種聲音都充滿於故事之中，但是

隨著這三個故事的進展，每種聲音相對的力量都在改變，而這些改變影響並反映了 Sarah 的政治參與。醫療的聲音很明顯地呈現在第一和第二個故事裏：第一個故事的醫生「發現我是一個 DES 女兒，因為我有腺嘌呤核苷缺乏症（adenosis）」，而第二個故事的醫生「呈現給我整個輪廓，說明了這可能是如何發生的……為什麼她認為是和 DES 有關」。生活世界的聲音，以及隨著認識而來的複雜情緒，在故事二關於流產的一段告白裏，顯露出來：

248 我可以記得當我的母親說：「也許這是因為 DES 的原因」

249 我說，「不要那麼神經了」，

250 L：嗯

251 嗯因為我真的是如此覺得

252 我認為她感覺很糟

253 L：嗯

254 她真地——

255 我的意思是說我們都心亂如麻

256 但你知道，對於我失去寶寶她覺得自己似乎要做點什麼

257 這是我無法忍受的

在流產的震盪之後，她的醫生和母親都無法說服她，這件悲劇是因為 DES。Sarah 不讓自己感覺到那麼快就失去了寶寶，悲痛也無法滲入。幾個星期之後，與一個「做了很多研究」的醫生的談話裏，才「呈現給我整個輪廓，說明了這事可能是如何發生的……一切都明白了」。

第三個故事的完全版本顯示，隨著時間，Sarah 把醫學的聲音整合到她的生活世界裏，但同時也抗拒它所造成的限制。一個反抗性的意識出現，Sarah 發展出自己的想法：「醫療對她的母親開了 DES 的處方，導致了她的流產（把她暴露於 DES 的影響下，也沒有警告這可能帶來生產上的風險）。因此，醫療的方法是錯誤的。」（Bell, 1988, p.116）在第三個故事的評價裏，Sarah 把她的流產的事實歸咎於醫療系統：

329 （inhale\*），嗯，我擁有的愈多我愈能遠離那些發生在我身上的事

330 時間一久它，隨著時間過得愈久我愈感到氣憤，對於這些發生在我身上的事，

- 331 嗯，而那，我真的是如此地感覺（4\*）  
332 這個事實我這我不應該會失去第一個小孩  
333 事情應該是有所不同的（1.5）（p.116）

就如同 Bell 所談到的，這裏是有點模糊的。332 行是指 Sarah 認為自己應該為流產負責（她把 DES 的問題「沒放在心上」），或者指 DES 的藥被開給她母親的這個事實？這行也可能指出另一個錯誤——她的醫生應該知道她處在流產的危機下且得保護她，但「事情應該是有所不同的」，她現在參與了一個為此服務的社會行動組織裏——為了所有 DES 的女兒。

總而言之，Bell 提供了一個敘說分析的模式，在這個例子裏澄清了認同的轉換。藉由研究訪談的故事次序（sequence），以及它們之間的主題與語言學上的關聯，研究者可以看到個人是如何把有意義的事件和他們生命裏重要的人際關係聯結在一起。分析者區辨出敘說段落，把故事簡化為主要敘說，檢視當中的用字遣詞，檢視結構和句子如何與

---

\*譯者註：停頓的秒數。

其他的部分回應，探究一個故事裏行動的次序如何建立於先前的故事之上。重要的是，對於語言的強調——人們是如何說出他們做了什麼以及他們是誰，以及他們說故事時用來建構經驗的敘說結構。這個取向讓我們看到了人際脈絡（interpersonal context）：訴說者和聽者之間的關聯，這是所有人類互動的基石，研究訪談也不例外。

## 問題

首先，Bell 如何把訴說轉變成文字形式，以及敘說段落是如何被決定的？她給我們兩種文本——三個故事的主要敘說（如同她所建構的）和「較完整」的陳述，包括離題的話、評價的句子、與主要敘說相關的對話。有些人也許會說「較完整」的文本太多了，它們很難閱讀，特別是習慣於「清楚」敘說的人（例如 Ginsburg 和大多數質性分析者所呈現的），Bell 的文本比起 Ginsburg 的，的確對讀者提出更多的要求，他們需要注意不流暢的地方、停頓、吸氣、語氣詞（如嗯等）和互動。從 Scheff（1990）的微觀社會學（microsociological）架構來看，Bell 特別突出創造和維持社會聯結關係（social

bond) 的對話，在這個案例裏就是指研究訪談的女性之間的關係，關注的焦點不只是她們所說的話，更關注於它如何被說的，例如，沉默，以提供時間給其他人說的機會。Bell 的文本基本上展現了兩個女性如何理解對方時的不易察覺的過程。

在這種分析之下可以預期的是，Bell (1988) 會用一長段註腳說明她的轉錄慣例，訴說的語言是如何被轉成文字的言說——見圖 1-1 的轉錄過程。另外，她解釋她的謄本「並非完全等同於訴說」(p. 103)。它們的確排除了姿勢、視線，以及在會話中可能攜帶意義的其他非語言的溝通面向。

其次，敘說的哪些面向可以作為解釋的基礎？明顯地，Bell 關注於訪談對話當中的敘說段落，和它們之間的語言上的關聯。她同時注意故事之內和之間的次序。在訪談中我們沒有談到其他的敘說，以及它們的主題為何。Bell 的目的是顯示 Sarah 如何將她的 DES 經驗變成一個積極參與政治的女性，而這三個敘說皆是以此為焦點。

Bell 把「敘說」(narrative) 等同於「故事」(story)，並進行了結構性的定義。如前所述，敘說理論曾經區別了兩者的不同：「敘說」是一個修辭學上較為完整的詞彙；而「故事」則是一個有限

制的文類。Bell 的分析方法保存了受訪者選擇的次序組織，以及與聽者合作，概要地重述了過去的經驗。每個故事都可以辨認出開始和結束（coda），「由聯結完整的類別（即單元故事，episodes）所組成，依時間或因果彼此產生關聯」（Bell, 1988, p. 101）。Labov 的結構性架構（狀態、複雜的行動、評價、解決方式）成為 Bell 解釋方法的基礎。

另外，還有一個相關的成分（這不是由 Labov 所強調的），即故事的開始和結束是在訴說者和聽者之間的交往行動中發生的，以及聽者需要將故事編碼及解釋。說故事本質上就是一個合作的過程（參閱 Paget, 1983），這個觀點影響了 Bell 如何呈現訪談資料，聽者/提問者說話的部分都要包括在內，並進行分析。事實上，在故事一裏，聽者提供了主要敘說的摘要（參閱謄本 2.2，002–003 行），這是一個不常見的分析步驟，但是符合 Bell 的立場——故事是互動中的產物。一個閱讀 Bell 文本的方式是，分析社會互動時，訴說者和聽者協調的過程（Scheff, 1990），即女性彼此間的理解和聯結（不管是情感上或認知上），是如何經由語言完成的。Sarah 故事的形成——有清楚的狀態、建立了行動和後續解決的方式——這與 Bell 身為一個積極傾

聽者的角色有關。她提問、聆聽並回應 Sarah 所說的故事。因此，Sarah 也澄清並發展了她的故事。若是以不同型態的方式互動，可能會產生不同的故事。

Bell 並沒有討論她是如何解釋這些故事的界線，即故事的起始和結束是如何定義的（如同前述，這毫無疑問地在每個案例都有影響的，而且可能是重要的解釋性決定）。她的確關注於語言、仔細察用字和句子（例如：「我不應該會失去第一個小孩」）。藉由展現了對字詞不同的閱讀方式，她揭露了語言的不確定性（*indeterminacy of language*）——它為何是一個意義曖昧含糊的符號系統。

最後，誰決定了敘說的意義和另類的閱讀是否可能？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意義是彼此合作完成的，涉及了訴說者、聽者/分析者及讀者。訴說者的原始話語並沒有被隱沒，它們全都以曖昧含糊和凌亂的方式出現。分析者可以控制意義的範圍，她選擇了兩個女性間的這個言說，具有哪些特色，哪些特色成為她文本的對象，是她解釋了這個言說。Bell 決定了這三個故事個別的主題。但是即便如此，說者還是有聲音的：這三個故事的標題是來自於 Sarah 自己的話。決定某個敘說的焦點是一個解釋的議題

(Mishler, 1986b)，但是我們或多或少也可以關注於主體所使用的語言，它或許不會將敘說的重點明白的說出。而讀者可以看到解釋是如何產生的，同時也可以想像其他另類詮釋的可能（圖 1-1 的第五個再呈現層級）。

Bell 把故事三解釋為朝向於政治行動的進展，身為一個讀者，我發現自己質疑她的解釋。我很好奇 Sarah 實際上目前對政治有多投入，例如，因為她是一個 DES 女兒，她變得更加關心醫療系統對女性的對待，但是她做了哪些行動？故事三是無趣的，缺乏了細緻的描述，只集中於 Sarah 如何參加 DES 行動聯盟的細節——聽到一個廣告、打電話、收到包包和卡片、在咖啡店和一名女性會面。這個過程聽起來更像社交而非政治。沒錯，一旦發現與其他女性的共同性，團體性組織就會開始 (Ruzek, 1979)。但是主要敘說接下來的一段 (329-333 行) 立刻轉到，她對於「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感到生氣。但是我還是不清楚 Sarah 如何改變了她的責怪、對於自己的處境為何有集體性的理解、如何產生政治行動。為了解決這些解釋上的問題，我檢視了故事三的全文 (Bell 讓讀者可以獲得這些資訊)，找到了下面這一段。藉由一個較長的停頓，個人的憤

怒被區隔於這些話之外，在這裏可能有一個想法轉變的歷程：

- 
- 335 (2.5\*) 如果有什麼我可以做的或是幫助 DES 女兒變得更果  
決  
336 並且得到較好的醫療照顧 (1.5) 以正確的方式，  
337 或者，幫助，婦產科醫生，更加意識到……  
338 這是這是我想做的事
- 

之後她談到「DES 女性如何過度地被保護」，「有些女性還不知道這是個嚴重的問題」，使得我對於解釋上的問題獲得部分的解答，現在我傾向於同意 Bell 對這個故事的閱讀，雖然其他的讀者也許不認為 Sarah 是積極於政治的。但是我仍然迷惑於故事三為何是平淡無趣的，而我很好奇之前的談話脈絡為何。只有當全部的敘說資料可以從作者那獲得，讀者才有可能進入意義建構產生的過程（第五層級）。

---

\*譯者註：停頓的秒數。

從這個例子得到的啟示是，Bell 分析策略的一種應用方式是，把訪談的反應化約成主要敘說，並在同一樣本中比較這些主要敘說。敘說——特別是那些關於重要生命經驗的——基本上都很冗長、充滿了離題的話語、評論、倒敘、直敘、狀態和評價。沒有採用某種系統化約的方法，而認為可以「只呈現故事」的想法是太過天真。主要敘說是一種激進的手術，一種把「整個故事」改寫成可供比較的形式（在第三章，我提供更進一步的指引，說明敘說如何化約）。從主要敘說排除的資料（例如評價）之後，可以再被採用（如同 Bell 所做的），用來解釋看來相似的情節中，是否有不同的意義。一個研究者可以把 Bell 的文本取向和 Ginsburg 的情節/故事取向的特點加以結合。

## 詩的結構和意義

最後這個例子是我自己的研究。在《離婚話語（*Divorce Talk*, Riessman, 1990a）》這本書裏，檢視離婚的夫婦如何理解他們的婚姻和他們自己，以及在這個過程中，男人和女人的理解有什麼不同的。

確，離婚帶給男女雙方相當大的情緒困擾和健康問題。我想要去了解他們如何將這些情緒困擾說出來，而且女人和男人建構的方式是否有不同的地方。我要比較不同性別講述不幸時的說詞，以及看看這個研究結果和傳統沮喪量表的量化分析結果之間，存在著什麼關係。結果這兩種研究方法所得到的結果非常的不一樣，並顯示出女人和男人有著不同的情緒語彙，而這正是主流的心理健康研究沒有充分注意到的。

## 敘說方法

我詳細地檢視了我的樣本（ $N=105$ ）中的六位成員，其中包括 Cindy（一個化名），她的故事的一部分被呈現在謄本 2.5。她是一位年輕且離過婚的母親，目前正接受福利金救助，曾接受過量表的施測，結果發現她的心情沮喪分數接近所有女性分數分布的上限。就像她所說的：「所有的一切都是非常非常難受。」她訴說了自己生活中的困境，包含四個方面，而這四個部分也幾乎能對應到四個角色的限制：小孩、生計、擔心有關贍養費的問題、以及缺乏幫助等，而這些同時也能用來預測這群女

性樣本的沮喪分數（參閱 Riessman, 1990a）。

Cindy 的故事形式引起我的興趣。我並沒有訪談她，是我的協同研究人員進行訪談的。她是在填完一份沮喪量表後（也許因為這上面提到許多症狀），接受訪談，她會跳離原先設計好的問題，然後她就說到近來「一直很糟的事情」。Cindy 冗長地講到她所面對到的困難，以及她所經驗到的情緒。當我想要把她的反應編碼時，就「覺得」那好像是個敘說。我會覺得自己並不想要將它碎裂成幾個不同的主題類別，反而想要把它當成一個言說（discourse）的單位；所以當我要把它再轉錄成一種適合分析的形式時，就覺得它「像是」一個敘說。因為它似乎有結構而且有主題地凝聚在一起，並且依序緊密地接連著。不過它並沒有符合 Labov（1972）的標準：以傳統的角度來說，它並沒有情節，敘說子句也很少，而且動詞也常是現在式，並非簡單過去式。這些困惑促使我去尋找其他的模式再呈現這個言說（discourse），看看是否有其他的方式理解 Cindy 如何組織她的敘說，以及她是如何達成其連貫性，以致更能抓取到它的意義。

謄本 2.5 展示了我對 Cindy 的敘說的結構分析，一部分也報告在 James Gee（1985, 1986, 1991）探討

語言的詩意特色的研究當中。這是一種文本的理想式的呈現方式，因為它排除了訴說者與聽者之間的互動、錯誤的開場白、暫停、言說的記號、非語詞的表達以及其他口語的特性。（完整的述說，參看 Riessman, 1990a, pp.131-134）

### 騰本 2.5 Cindy 的敘說

#### 框架

- 03 我一直游移不定
- 04 在這狀況上持續一個月左右
- 05 感覺到事情是非常非常艱難
- 06 就好像有一朵烏雲籠罩著我而且我非常混亂

#### 感覺和衝突

- 09 我覺得好像 第 1 小節
- 10 我超過負荷了
- 11 而且我無法想像怎麼
- 12 減輕負擔
- 13 我覺得 第 2 小節
- 14 我做的每件事情我都需要做
- 15 所以我不知道怎麼
- 16 把某些負荷
- 17 卸下
- 19 嗯，我需要去工作 第 3 小節

- 20 為了生計 (錢)
- 21 我需要 第4小節
- 23 上學 (學校)
- 23 這樣我才不會總是做白工
- 24 我需要 第5小節
- 25 當一個好媽媽 (照顧小孩)
- 26 因為這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 27 而且我想要 第6小節
- 28 騰出一些空閒時間 (給自己的時間)
- 29 假使我可以的話

第一個部分：錢（敘說）

- 33 必須跟著福利系統的改變而動
- 35 因為我過去是藉助福利生活
- 37 ……他們把我的補助刪掉許多
- 38 因為我也在工作
- 48 所以我正處於一個轉折點面臨選擇
- 49 要就完全不去工作
- 50 要不就是從他那裏拿錢
- 51 或者不工作
- 52 而且我
- 53 在一個聽起來像個好念頭的轉折點
- 54 不去上班
- 55 所以我可能
- 56 去學校而且不會感覺到
- 57 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 58 但……嗯經濟上我不可能完全獨立  
59 沒有什麼方法是我可以做的  
60 而且福利不穩定地給付  
61 我擔心我會被  
62 退學  
63 而且我只剩下一年要畢業  
64 也因為我不要造成  
65 被退學的狀況  
66 我只能停止接受社會福利  
75 我不知道我的工作還能維持多久  
78 所以我的經濟狀況目前是  
79 完完全全不穩定的

#### 第二部分：學校

- 80 而且我有兩科沒修 第 7 小節  
81 在我這學期所修的三門課程中

#### 摘要

- 82 所以那讓我想到了 第 8 小節  
83 試著繼續求學  
84 以及工作和當個好媽媽，這些部分是太沈重了  
85 但我不知道我如何能不去做

#### 第三部分：養育小孩

- 86 同時間為某種理由 第 9 小節  
87 我的兒子又相當黏我

88 而且他可能又趁我最忙的時候黏我

89 僅能應付些你知道的

#### 摘要

90 所以同時間有很多事情要做 第 10 小節

91 在這一個月左右

#### 第四個部分：自我（敘說）

92 而且我一直

93 跟我所遇到過的所有人一樣

94 真的很需要自己

95 你知道我要什麼

96 需要有個人來到家裏

97 然後會說「來！坐下來

98 我幫你倒一杯飲料

99 讓我們閒話家常」

100 你知道的就是有個人照顧我

101 所以我一直更感覺到沒有這樣一個人存在

#### 框架（回到情感和衝突）

102 我想要 第 11 小節

103 我必須做個決定

105 我不知道做什麼決定

106 我不斷游移等待做決定

---

來源：改編自 Riessman（1990a）。經過 Rutgers 大學出版社和作者同意後再印。

Cindy 講述這個敘說時，運用了某種隱喻，將敘說的開端無可避免地與它的結果相聯結。她把她的心情狀態比做行走（walking），頭上彷彿有烏雲在籠罩著，無法看透它。她在晤談進行了十分鐘後，就在她結束冗長的敘說，她以同樣的意象來看自己不安的情緒（「我一直游移不定而無法做決定」）。這個隱喻為敘說增添結構的連貫性，且顯示了它的範圍，也就是說，界定敘說從哪裏開始及到哪裏結束。就主題方面來說，這個隱喻顯示了移動不定及缺乏決心。Cindy 一直沒達到較穩定的情緒狀態上。

在我的呈現中，Cindy 的說詞（可能像其他所有語言學家主張的說詞）有一種小節（stanza）的形式，讓敘說能有凝聚力。小節（stanza）是指在單一的話題上的幾句話，是平行的結構，而且訴說者訴說時依著相同的速度和鮮少的停頓，讓人聽起來這些話是配在一起的。Gee（1985, 1986, 1991）主張小節在有目的的敘說時是種通用的單位，且他也認為詩實際上是援用我們日常生活的方式。詩將每日生活的用語變得「陳腔濫調」和儀式化。以 Cindy 為例，她用三到六個小節，形成四部分的解釋，說明她為什麼會覺得這麼沈重，且這樣的解釋充斥在

後來她所說的故事中。當她列出在心中認為造成她現在困境的四個區塊——生計、學校、小孩的養護、以及沒有她自己的時間——她從外圍事件開始談起，從較大主題談到最細微的問題。這緊密的結構清楚地表達了一種限制感；供養者、學生和媽媽的角色彼此發生衝突，因為這每一個角色的預期是那麼不一致，才會造成無法解決的情緒困境。在從社會層面談到個人層面的轉變，其中節的次序也反映了 Cindy 把改變的責任從外在而內化到自己身上。她覺得這困境是她個人及私自要去解決的問題，縱使她的不幸是牽涉到其他人的。

在將她的四個問題概述為四個小節之後，Cindy 接著發展每一個主題，一個接著一個地，細述其中的來龍去脈。在第一個部分她探討了生計的問題，她講到為了養活自己所作的努力，而且她明確地將這個問題歸咎於社會環境（換言之，「這問題與社會福利系統的改變有很大的關係」）。她講一個故事來說明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並重新建構且重新解釋政府補助的縮減、福利政策的改變、工作福利以及她工作的不穩定性，害她的經濟狀況是「完全充滿變數的」。

在接受晤談的那陣子，Cindy 正遇到雷根總統

第一次預算上縮減福利支出，和剛實行新的工作福利計畫，該福利計畫要求她在小孩六歲（目前五歲半）的時候去登記接受職業訓練。由於她還在修讀某四年制的學士課程（但並不被她所屬的州政府的工作福利部門認可為「職業訓練」），而且只要再一年就可以畢業，到時想必會更容易找到工作的，看起來她在被學校「趕出去之後」會有個好機會。但是，碰到這些不合理的政策時，Cindy 只好選擇終止福利救濟。結果，讓她必須依賴前夫給小孩的贍養費來過活，她還告訴我們，這些錢還不太固定，所以這也是她的擔心之一。

Cindy 將第一個部分做摘要之後，即 78 到 79 行，就跳離這種敘說模式。她並沒有再敘述另一個正式的敘說，反而在中間兩個部分（即謄本中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時都使用非敘說的形式，來解釋她困境的來源，及造成的情緒衝突。第二部分——跟學校有關的辛苦——只講了兩句，簡潔且精練地說明她如何解決掉這重疊角色的困境。就像她在前面提到有關經濟負擔的陳述（「我剛停止補助」），這裏也出現說明她如何解決這個困境的積極語調（「我有兩科沒修」）。然後，接著四句的一個小節，即第 82 行到 85 行，再明確地聲明自己

負荷過度的主題，這聽起來就像個摘述。這一小節掌握了福利政策為 Cindy 這尷尬處境的本質，保有一份工作是必須的，因為福利的縮減和工作福利本身都要求她得這樣，可是繼續求學對於要獲得一份像樣的工作卻又是必須的。

在第三個部分，Cindy 詳盡地闡述了她要當一個好母親的問題——她的五歲大的兒子「正處於愛黏人的年紀」。他總在她「最不能夠分身」的時候緊黏著她。從她選用「能夠（afford）」這種反諷的字眼就顯現：她為人父母的情緒應變資源就像她經濟資源一樣，都是有限的。

在第 90 至 91 行的總括性對句，Cindy 用一種陳述將前面三個部分繫在一起。她說，最近特別困苦，因為必須兼顧生計、學校和小孩養護的要求（「同時間有很多事情要做」）。正是這種角色間的張力推擠成一團，讓她感到十分沈重，而不是任何單一的問題造成。

第四個部分，第 92 行到 101 行之間，Cindy 提到她前面說的一個主題（沒有時間撥給自己），但這裡有個轉折。在跟「所有其他的事」比較起來，她一直覺得「真的很渴求」自己。但她要的並非能夠獨處，而是希望有個人能支持她、呵護她。

第四個部分的焦點不是過去已經發生的事情，而是她希望未來會發生的事情，結果，最後 Cindy 訴說了一個假設的故事。透過對話，她建造一個文本中的文本，一種帶有質地和向度性的多重聲音的敘說（multivoiced narrative）（Wolf和Hicks, 1989），是那麼深深地打動人心。第 96 行到第 101 行之間，她用了假設性的語句，來表達內心的夢想。如同她的兒子一樣，她也希望有個人可以緊緊賴著。

Cindy 最後說到目前尚未解決她所提到的困境，不像其他許多敘說講的是過去發生的事情，而她講的敘說，是關於角色變換的張力和不幸，缺乏確切的解決方式以及結論，因為敘說者仍然處在衝突之中。在第 102 行至 106 行之間，她又回到原先行走的隱喻，用現在式「我想要」的這個片語，以及她在好幾分鐘前開始使用的小節結構。她深陷在要做出決定的思緒中（在四句話中提到三次），而要做出何種決定又是相當地模糊不清的。而我們知道的是，Cindy 在面對多重的壓力且又沒人幫助她的情況下，那種深陷泥沼的感覺。雖然在某個層次上，問題的根源無疑是公眾的，但她又把這經驗當成個人的且私人的，以至於當她去評估自己的狀況時，她會說現在就等她作出決定來「解決」事情。政治

的運動沒有出現在 Cindy 的敘說中，不像 Kay 和 Sarah 的案例一樣，那樣可以提供另一種理解和集體的解決方案。

圖 2-1 是我從這個言說結構中，理解到的基本張力結構圖。第 3 行到第 29 行之間和第 102 行到 106 行之間，講到一些持續的狀況，為兩個敘說的段落形成脈絡。這些持續的狀況，本質上並非敘說；只是延續不斷的，並且本質上是進行中的，表明那些持續中的、進行中的和非特定的部分。這些持續的狀況是言說的開端和結束，有兩個敘說的片段鑲嵌在其中，第一個部分是一個故事，涉及社會福利和工作福利的特殊過去事件（第 33 行到第 79 行之間）。而另一個是一個假設性的敘說，是希望被照顧的夢想（第 92 行到第 101 行）。雖然有些其他的部分在這兩者中間，這兩個敘說是彼此相對立的；表明了某個基本的困境：真實的與可能的，現實的與希望的。就像 Cindy 的解釋也是由主題式的對比所訂定（工作福利對比學校，小孩對比自我），所以它的形式也是由非敘說與敘說、故事與夢想並置而成的<sup>4</sup>。跟前面的兩個例子一樣，都是關於不合諧的敘說：講述人類尋常、預期中的生活面臨的裂縫，這正是 Cindy 透過緊密的敘說所了解

到的一個主題。

總括來說，我的取向提供了另一種模式，用來分析在研究的訪談中，那些聽起來像是敘說的開放性談話。其中牽涉到將冗長的反應化約，根據一組規則，將那些句子從語法上分析成行、小節和區塊，並檢視其構成的隱喻，並建立圖示來展示其中的結構——一個與前面兩個例子有很大差異的分析形式<sup>5</sup>。（第三章將更詳細地描述如何進行化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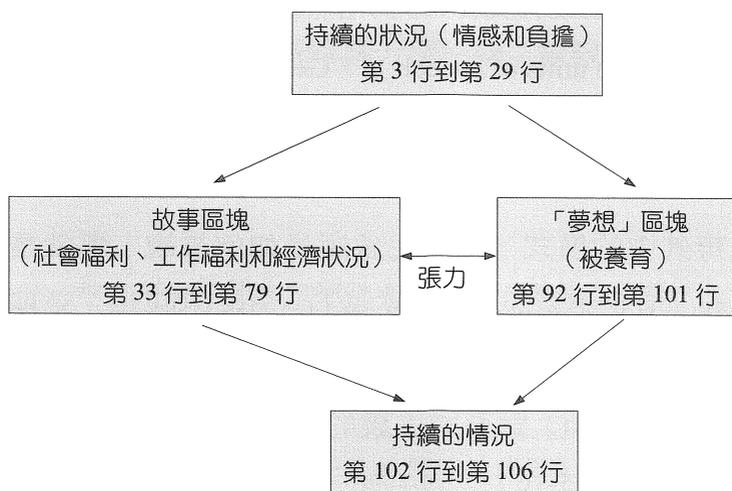


圖 2-1

## 問 題

因為這是我的作品，所以我覺得如果要評論的話，它比先前的兩個例子還要困難，可是容我一試。第一，敘述如何被轉換成一個書寫文本，且如何決定這些敘說的區塊？Cindy 的長篇反應沒有化約成一個主要敘說（core narrative）或一個綱要式的情節——那幾乎不會遺漏任何東西——但反而是參照 Gee（1985, 1986, 1991）的說詞單位的理論（theory of the units of speech）。Gee 採用口語而不是書寫的文字當作語言的文本模式，且他強調韻律和副語言兩方面，比如在音調和聲調上的改變。為了分辨其中的模式，我關注敘說是如何被說，那就是說，我把這言說系統化約成行、小節和區塊。這種再呈現方式和分析模式可能被說成是一種形式主義（formalism）對形式主義的評論反應（參閱 Gee, 1991, pp.15-16），其中有一位出版商說我的這種取向是「自命不凡的」。

當我開始以 Gee 言說單位的理論來分析 Cindy 的長篇反應，我起先是有些懷疑的。我懷疑真的有像他主張的那樣，言辭是有結構的，且較認為可用

詩的結構來再現言說，而不論言說內在本身的結構。不管哲學觀點上的差異，當我重複聽著錄音帶，讓我對語言中的精微處更加敏感，注意到我以往不曾覺察到的，以及在先前的登錄稿（謄本）中必然不會注意到的地方——像音調輪廓、聲音的高低起伏以及停頓和言說標記詞（discourse marker）（如 好（well）、那麼、而且、所以、像「嗯（uh）」的狀聲詞）。這些地方，Gee 認為都是敘說裏各小節的開端。我發現 Cindy 的敘說（看謄本 2.5），每個部分真的都有這樣的語助詞。當我逐漸熟悉登錄的手法，我聽到一個結構：敘說的每個區塊、每段話，都在講述同一個話題、同一個短文，以一個小節的形式出現。

每一個小節都是一個特定的鏡頭，捕捉人物性格、行動、事件、聲稱或一則訊息，且這些都牽涉到焦點人物、焦點事件的轉換，或在時間上或先前小節中，事件的架構的改變。每個小節都代表了一個特定的觀點，是著重在看到了什麼的觀點，而非從誰在觀看的觀點來說；可以說它再現一個影像，就如同一台「照相機」正在對焦在一個「景像」上。（Gee, 1991, pp.

23-24)

在聆聽 Cindy 回答什麼是「事情一直很艱困」的反應，與自腦海浮現的 Gee 的理論，兩者相互交融後，我把這化約的結果呈現在謄本中。呈現的方式主要是放在如圖 1-1 所示的登錄和分析的交會處，意思就是，如何展示言談的內容，往往跟解釋的過程密不可分。

諷刺地，某些言辭的特徵，其實在分析敘說結構時是很重要的，但往往在再呈現時被排除（例如，停頓和言說標記詞（discourse marker））。訴說者與傾聽者之間的互動情況也沒有被呈現。當敘說結束時（就在第四個部分講完假設性的敘說之後，有一個很長的沈默，然後被一個聽起來像鼻子呼氣的聲音打破，緊接著是大家的笑聲），並沒有給這位女性的情緒狀況一個位置。Gee 的方法在敘說中去除掉了晤談的脈絡，這一點是值得爭議的。

（因為這層顧慮，所以我在《離婚話語》一書中，就決定呈現全部的反應，而謄本 2.5，那是一種策略，用來說服我的編輯）

在這裏敘說的定義是什麼？我以兩種方式使用這個字：第一，用來指稱 Cindy 整個的反應，這符

合一般的標準（有次序、主題和結構的連貫性）；再來，第二，用來指稱第一部分和第四部分，僅符合了某些標準（有時間順序、評價）。在圖 2-1 中，我沒有採用 Gee 的方法，但卻為複雜言說形式提出一種論點：一個大的敘說包括了敘說的部分和非敘說的部分。Labov（1972, 1982; Labov & Waletzky, 1967）的理論和他相對地以較為簡單的故事進行的分析，並沒有辦法為主觀經驗、或者那些隨時間而擴展並延伸到現在的事件，提供一個適當的分析模式，像 Cindy 的敘說就是一個例子。特別是關於她的敘說中情感性的「行動」，即訴說者對事情的感受以及她對自己所說的，就好像以較客觀的角度來看「過去發生了什麼事」一樣<sup>6</sup>。

第二，到底敘說的哪些面向是構成解釋的基礎？很明顯的並不是互動的情況，在這裏所注意的焦點是 Cindy 所作的語言的選擇、以及找出言說的形式、或文本怎麼被述說的。Gee（1991）認為許多解釋被這種口語敘說的結構所排除。我的解釋考慮到結構的特性（架構、小節、部分）、重要的隱喻（行走）、重要的字眼（「能夠」）、動詞語態（「我已」對上「我剛停止福利」）、以及許多主題如何從上述這些發展出來、以及其他的語詞的選

擇。我試圖超越文本本身，並且對相關的脈絡進行推論，而我個人的政治傾向變遷中的社會福利政策、以及這些政策對美國社會中的單親母親的影響，對這種脈絡的推論提供了相當的訊息。

如果排除掉建構敘說的訴說者與聽者之間的互動時，即把訴說當成是單一作者的產物，訴說早就存在於訴說者的腦中，也就是說，訴說時的情境並不是解釋的一部分，排除掉因互動脈絡而形成的敘說形式和意義，這點是可以爭論的。舉例來說，Cindy以這種方式發展她的敘說，是因為兩個訴說者都同意一個主題，「近來事情一直是很艱困的」。如果有不同的互動，也許會建構出不同的敘說。（將Gee的取向擴展到訴說者之間的言說，參看Mishler, 1992）

最後，誰來決定這個敘說的意義？而且其他的解讀方式有可能嗎？Cindy的說詞和我的解釋都同時呈現給讀者，雖然它們是以合併的方式呈現（書中的三個例子都一樣）。我解釋的基礎，尤其有關結構的部分，沒有呈現在謄本 2.5 中，只有在所有反應的總謄本中（在第三章中會呈現其中的一部分），訴說者即使沒有做最後的結語，至少他前面的說詞可以作為解釋的依據。

當我在分析 Cindy 的長篇敘說時，它本身的組織讓我發現了某種意義。她可能已經嘗試過不同的方法來表達。而她這一次所選擇的形式代表什麼意義？我聲稱我們可以透過經驗到敘說結構中的張力（即現實與希望，或故事和夢想之間的對比並列）我們可以接近她的主觀經驗——亦即在她訴說的當下，什麼樣的生命對她有意義<sup>7</sup>。

## 注 釋

- 1 女性主義者對這本書《競爭下的生命》（*Contested Lives*）（Ginsburg, 1989a）有著非常不同的反應。有些人批評這本書缺乏對種族和階級的關注，這些部分請參閱 Bennett（1989）。如同我在圖 1-1 的第五層級的建議，生命史之後還有後續的生命：讀者對出版品的反應（Blackman, 1992）。
- 2 在生命史的研究傳統裏，有些學者的確將互動情況包含在分析的範圍內，而產生了一個特殊的敘說。（參閱 Anderson & Jack, 1991）
- 3 例如，在一個憂鬱症女性的研究裏顯示，對於“dependent”這個字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參閱 Jack（1991）。
- 4 我很感謝 Dennie Wolf 對 Cindy 的敘說中，張力的結構所提供的洞見，以及她所繪製的圖 2-1。
- 5 在《離婚話語》一書中，我把這個取向跟統計分析做比較（Riessman, 1990a）。仔細注意 Cindy 的

經驗所提供之脈絡來解釋一個多元回歸方程式，例如，金錢的短缺就不單單是一個預測沮喪程度的變項而已：在 Cindy 這個個案上，情緒上的煎熬是因社會政策所造成的，這使得女性被迫在工作、學校和福利救助資格之間進行選擇，這危及到當事人尋求自我獨立的努力，同時也帶來了痛苦。同樣地，Cindy 有個黏人的小孩的經驗以及渴望有人照顧她的心情，顯示量化模式之中其他的變項——養育孩子和欠缺幫助——在脈絡中的真實涵意。

- 6 如果要更詳盡地了解 Cindy 的敘說違反了 Labov 的標準，請參閱 Riessman (1990a, pp.253-254)。
- 7 其他人可能會有不同的解釋，在我的博士班的質化分析課上，有一位非常有經驗的學生表示其中的意義不證自明，而且 Gee 精細的結構分析對了解其中的意義根本幫不上忙。雖然他沒有參與研究 Cindy 的敘說，但參閱 Gee (1991) 所呈現的。我們討論的是一個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女性所做的敘述，Gee 把這個敘述用行、小節和詩節 (strophes) 等等方式再呈現了一個令人信服的連貫性故事。一個禮拜過後，我在課堂上，針對同

一段談話以不同的方式呈現給學生當做練習，用一般常用的方式登錄，即以連續的行列方式登錄。大多的學生都同意這樣的方式在呈現這位女性的敘說是不連貫的，而且臨床心理學的學生也很快地說這個文本是「鬆散的」、「跳躍式的思想」，這些都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思考的主要特徵。這個文本因此有了不同的意義。這個練習打動了我們，而且使得每個人（也許除了持懷疑的學生）相信文本雖然可以有多種不同的方式解讀（但不是無限多種的），但是意義和文本的呈現方式彼此是互相依賴的。

## 第三章

# 進行敘說分析

---



研究者要如何進行敘說分析呢？有一連串解釋方面的抉擇是所有研究者必須面對的。回到圖 1-1，研究者必須考量到在晤談過程中，如何促進敘說式的談話（第二層），如何以目前的某種目的而轉錄資料（第三層），以及以何種取向分析敘說資料（第四層）。我對這些議題會提出我的想法，然而那並不是一組處方或規定，而是幫助開始進行研究的一種引導。跟其他形式的質性分析比較起來，這種並沒有所謂標準的程序。

## 訴 說

為了鼓勵我們所研究的對象能夠關注並說出他們生命中重要時刻的事情，有必要在研究的晤談過程中，提供具有助益及促進作用的脈絡及氛圍，亦即我們必須涉及晤談程序及進程。某種開放式提問方式是比其他類型的提問方式，更能鼓勵事情的敘事化（*narrativization*）。例如比較「這事是什麼時候發生的？」與「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兩個問句，前者是要求能夠得到某個具體的訊息，後者是希望問到關於過去更多的故事。最好是能問一些問

題，來開啟一些話題並容許受訪者自己去建構答案，同時在與傾聽者合作的情況下，一起找出其中的意義（Mishler, 1986a）。即使有些可以被回答是或否的問題，也能讓對方說出很多的話：研究黑人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的種族歧視，Essed（1988）問道：「當你去應徵工作時，你曾有被歧視的經驗嗎？」許多女性常以說故事的方式回答這個問題。

為了研究暴力，Labov（1982）詢問了城市裏的年輕人，「你曾經身處你認為有可能被殺的嚴重危機當中嗎？」為了研究在教師與父母之間的道德衝突，Attanucci（1991）問道：「你有過當你並不確定正確的做法是什麼，可是你又必須做出決定的時刻嗎？」因為講故事的衝動是很自然的，且明顯是普遍共有的，所以這類的問題幾乎無法避免都將會得到敘說式的說明，除了課堂上的晤談練習，才可能沒有敘說式的說明。

某些研究者一直發展視覺的補助教具試圖引發敘說，Veroff et al.（排印中）提供下列的指導語給他們所要晤談的新婚夫婦們：

用你們的話來告訴我，你們之間的故事。我沒有設定問題來問你們……我只要你們告訴我，

你們生活在一起的故事，有一個開始、中間和未來會如何……沒有所謂對或錯的說故事的方式……以你們最舒適的方式來告訴我……可能會說到你們所喜歡做的事情……你們每一個人都可以說，且我希望能聽到你們每個人的故事……你可以贊同這個故事，也可以不贊同它……任何你們感到舒服的方式。

為了促進回憶，這位晤談者呈現一個記事板給這對夫婦，並且說：

為了幫助你們想起你們的故事，這裏描述了大多數人的故事軸線。你們看到一個婚姻的故事軸線通常包括這些部分：你們如何相遇；你們如何互相喜歡對方；變成一對；計劃要結婚；婚禮；在婚禮之後的生活像什麼；現在的婚姻生活像什麼；且未來你們認為婚姻生活將會變成怎樣……現在讓我們聽聽你們的故事，你們在一起之前的生活情形，你們之間的關係發展的故事，這一切是怎麼開始的呢？（pp.11-12）

有趣地，這些夫婦並非總是跟隨著指導語，他們並沒有依照 Veroff et al. (排印中) 所希望的，以線性的方式敘述他們的故事。

我偏愛較無結構的晤談方式，讓訪談對象有較多的掌控。我建議我的學生發展晤談的指導手冊 (Merton, Fiske & Kendall, 1956/1990)：提供五到七個關於研究主題的問題，再增加一些試探性的問題，用在當受訪者一直很難開啟話題時（像「你可以再多告訴我一些嗎？」「對你來說，這個經驗像什麼呢？」）。晤談就像平常的對話，其中有兩位參與者——訴說者和傾聽者或者叫做提問者，兩者共同發展意義，且需要讓雙方都有足夠的自由。傾聽者可以進一步問些問題，以澄清不確定之處，且「所給的答案能不斷地促使對話的進展」（Paget, 1983, p.78）。

當研究者已經完成量化和質化的分析，且企圖把它們結合在同一個研究中 (Riessman, 1990a)，那麼我建議學生，在同一個研究中，可以將設計用來產生敘說說明的開放式問題、封閉式的題項或自填的問卷相結合。不同的資料蒐集方法會產生不同的資訊，且它們必須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一般來說，學生必須符合學術上系所對量化的期待，且量

化取向較能適合蒐集某種資料，比如人口統計學方面的資料。結合兩種方法的學生必然會跨越學術邊界，甘冒被認為是非法外來者的風險，侵犯了「原本界定和用來保護傳統利益和常規的藩籬」（Mishler, 1991a, p.102）。

回到研究的晤談，將發現敘說常常在你最意想不到時出現。舉例來說，在研究離婚者時，我的協同研究者和我採用了 Goode（1956）所使用的題目：「請以你自己的話，來說明什麼是你離婚的主要原因。」（p.359）我們預期這個問題能夠激發出一系列的問題，讓我們可以主題式地編碼，如同 Goode 所做的，並且將 1980 年代婚姻中所「抱怨的主題」與 50 年代的相比較。然而，在我們的樣本中有許多人對這個問題的反應，卻是抓緊著發言權，講了很長的關於他們的婚姻故事：他們如何開始認識的、在這個過程發生了什麼事、婚姻轉變的時刻等等。在這些逐漸發展出來的故事中，最初的抱怨往往並不是造成個人最後決定要分手的原因。（我猜 Goode 的受訪者可能也是想要說他們的故事）

倘若研究者真的能夠放棄對研究過程的控制，且把晤談當作一般的對話來處理，那麼幾乎任何問題都可能產生一個故事。社會語言學家主張所談

到的事件必須是可報導的，才值得在日常生活的對話中長篇報導（Labov, 1982; Polanyi, 1985），但是，反之亦然。訴說者是在任何互動情況下，藉由故事的方式使事件可以報導。也許經驗性質的任何事情都值得說成長篇故事，或至少可以這麼做。

## 轉 錄

「有聲音的文本需要以聲音的形式呈現」（Van Maanen, 1988, p.131）。錄音和轉錄在敘說分析時是絕對必要的。學生都一定會掙扎於如何將晤談的錄音帶轉錄的問題，因為在質性晤談中，這些錄音帶通常是很長的。很不幸地，這裏並沒有任何容易的答案，因為要把言談資料轉化成書寫的文本時，正因為它是一種再呈現方式，所以就涉及了選擇和化約。我通常會建議先粗略地轉錄，即整個晤談的初稿，先包含了晤談中所說的話，以及其他的顯著特徵（例如，哭、笑、或非常長的沈默等）。然後，再回到所選擇的部分重新轉錄，以便做更詳細的分析。

在某些環境中並不被希望有冗長的故事，如醫

療晤談，病人常常必須要去爭取自己的發言權。Mishler、Clark、Ingelfinger 和 Simons (1989)，以及 Clark 和 Mishler (1992)，從粗糙的謄本中選擇一些片段來重新轉錄，以展示醫生與病人之間言及個人的故事與目前的醫療問題是否相關的微妙協商過程。在某個文本中，醫生不想去關心病人的故事，病人很明顯地相當生氣。然而在另一個案例中，醫生則促進發展對診斷所必須有的故事。重新轉錄的文本可以讓我們分析晤談中的打斷談話、暫停和其他的口語特徵，這些可以區分出細心的醫療照顧。

研究者常會將轉錄的工作委派給他人，像研究生和秘書。持某一特定理論信念的學者（例如，俗民方法論（ethnomethodology）），常常要更詳盡的謄本，所以從一開始，就有文書工作者，他們已經習慣這種要求，並且非常熟練地將言說呈現在雙向度的紙上。然而，大多數的轉錄者需要相當多的指導，指導他們如何正確地轉錄。

我有個切身的經驗，就是在先前說的離婚的研究中，當我的協同研究者回去檢查轉錄謄本的正確性時，她發現有些錄音帶中的話語，並沒有出現在打字稿上。我們詢問轉錄者，她說她把這些離題的

話省略了，並說「這跟問題無關」。但這些看起來並不相關的部分卻為解釋提供了必要的脈絡。常常，這些離題的話語也是敘說，是主題的核心部分。因此，這個編輯過的謄本必須要再重做了。

在進入下一個研究的層級前，我會花相當多的時間，跨越多次的訪談資料，仔細地看這些轉錄的初稿。此時，分析式的歸納（Katz, 1983）是最有用的。當我去看反應者說了什麼時，分析的焦點常會浮現，或者變得更清楚。研究就像敘說一樣，都是共同創造的；當研究者與受試者互動時，分析的觀念會隨著互動過程而變遷（Mishler, 1992）。當我細看謄本時，言說的特徵常會從記憶中「一躍而出」，受到先前的理論興趣和解釋的「前結構」所影響（Heidegger, 1927/1962）。

舉例來說，我記得在處理一位勞動階級（working-class）、波多黎各籍（Puerto Rican）女人的晤談謄本時，發現到有一些地方，是中產階級的白人訪談者誤解了她敘說的次序。因為長年對階級和文化多元性的興趣，所以這個互動引起了我的注意。為了更精確地找出溝通失敗的來源，我需要再重聽這個錄音帶，且轉錄了對話中幾個重要時刻詳細的轉錄稿。仔細的文本分析透露了這兩個女人之間對

比的時間假定——一個敘說究竟應該以時間或者以主題的方式組織，這樣的差別並不會出現在兩個白人（歐裔）女性之間，所以我想這是與文化有關的主題（Riessman, 1987）。因此互動過程中所產生的一些問題，為敘說分析提供了一個相當富饒的開端。

要將訪談的文本重新轉錄成一種敘說形式，這種費時而辛苦的轉錄工作，我不知道有什麼方法可以避免（當我在處理初稿時，大部分的內容都不是敘說的，例如問題和答案交替出現，評論、事件的時間表列以及其他的言說形式，所以我就會把它們放入括弧暫不處理）。在我的經驗當中，辨認出敘說的區塊和再呈現的工作是不可能委託他人的。這不是一個技術性的操作而已，反而是分析工作本身的內涵，敘說結構的「揭露」是解釋工作的重點。藉著這個層級的轉錄，解釋性的分類類別就會產生，錄音帶中也會聽到意義模稜兩可的說詞，以及口語的記錄——說故事的方式——提供有關意義的線索。從上述這些不同來源的領悟，塑造了一個重要的抉擇，抉擇如何把口語的言說再呈現成書寫的文本。

決定一個敘說從哪裡開始到哪裡結束，以及在生產敘說時的傾聽者／詢問者所占的位置，是與文

本內容同時，也與分析的議題有關。傾聽對方談話的起頭和結束（Jefferson, 1979），常常有助於我們確定一個較簡單的敘說。例如，我訪談過的一位正在協議離婚的男人，抱怨他的老婆把小孩看得比他還重要，然後說：「這裏我會用一個例子來澄清這點。」我回答：「好。」我們在一個簡短的開場白後，就聽他的敘說。然後他說了一個很長的故事，中間我沒有打斷他，只有在他說到他的老婆拒絕陪他去看一個狗的表演時，我才說了「嗯——嗯」的話（參閱Riessman, 1990a, p.103-104）。「例子」這個字，引導進這個故事的過去世界，而且幾分鐘之後他又用這個字，來標示從這個過去的世界離開；他說這個事件是「這整個關係的一個典型的例子」。於是他就從過去又回來到了現在。並非所有敘說都是這麼清楚地界定的。記得上一章 Bell（1988）顯示了傾聽者如何將Sarah的數個故事提供摘要。（參閱謄本 2.2 和 2.4）

一旦敘說區塊的界限被選定後，我發現如果把敘說分為行列，並且編號，這樣對重新轉錄是很有用的。（Jefferson [1979]，呈現一種廣泛使用的打字稿標記法；也可參閱 West [1984, pp. 42-44]）。我使用 Labov（1972, 1982）的架構來察

看簡單的敘說如何被組織的，這是解釋敘說前必要的第一步。回顧一個完整的故事，根據 Labov，是由一組共同的元素所組成，且每一句都有一個功能：提供摘要以說明接下來的是什麼（A），讓傾聽者了解現況（O），實行複雜的行動（CA），評估它的意義（E），且決定某行動（R）。表 3.1 的左邊顯示關於離婚敘說部分的初步謄本（轉錄稿），而在右邊，我呈現了同樣的談話的重新轉錄稿，轉成符合 Labov 的功能要素（注意在每一行的最後）的子句。注意在左邊的再呈現方式是如何排除了不流利的地方，以及右邊的再呈現則能夠將言說細微的特徵呈現出來，像短暫停頓（p）、晤談者的言辭（我：嗯——嗯）、口語的強調、以及字詞的重複。

表 3.1

初步的轉錄稿	再轉錄稿
這真的是一個決定性的事件，因為我終於站起身來並走到另一個房	30 而且 (p*) 最後，嗯就是，這真的是一件決定性的事件 [A]
	31 因為我終於站起身來並 (p)

\*譯者註：暫停。

間。她正在洗衣間裏	{ CA }
（跟她的愛人在講電	32 並 (p) 走到另外一個房間 { CA }
話），而且房門是關著	33 (p) 她正在洗衣間裏而且門是關著
的。我敲敲門，然後	的 { O }
說：「妳什麼時候可以	34 (p) 敲敲門然後說 { CA }
講完電話？」因為我們	35 「妳什麼時候可以講完電話？」
正要講話，可是她舉起	{ CA }
她的手，像這樣，說	36 因為我們，我們正要講話。 { O }
「不」。然後，我覺得	37 可是她舉起她的手，像這樣，說
自己完全在胡說。我狠	「不」。 { CA }
狠地揍門一拳，那根本	38 而且我覺得自己完全在胡說 { E }
不像是我會做的事情，	39 我狠狠地揍門一拳（我：嗯-嗯）
你知道的，我原本就完	{ R }
全不是一個會施暴的那	40 那根本不像我，不是我會做的
種人。	事情，你知道的 { E }
	41 我原本就完全不是一個會施暴的那
	種人 { E }

有許多敘說是無法符合 Labov 的架構，雖然，這個模式常常提供了有用的起步。敘說不只一種形式，而且跨文化的研究也顯示故事文法上的變異（McCabe, 1991，付梓中；Michaels, 1981; Riessman, 1987）。Labov 為他在有限的材料當中，找出故事清楚的開始與結尾的作法，提出一種強烈的主張，但幾乎沒有什麼規則，可用來分割那些看似敘說，卻更為複雜的晤談資料。故事的界限可以依據探究者整體研究架構，且反之亦然：研究者也可以

界定故事的位置，和找出在言談中其他的敘說片段，然後歸納方式建立起一個架構。而報導者是以組織故事的方式導引出解釋，包括故事的每個部分，以及它們與整體之間的關係。

雖然語法分析資料能幫助我們仔細地檢查一個文本，然而共同研究者對於同樣的文本可能會以不同的方式分析。某些變異應該被期待的，「因為傾聽者和讀者在傾聽和閱讀上是彼此不同的，且可能也跟訴說者和作者試圖表達的意圖有所不同」（Gee, 1991, p.27）。圖 1-1 以及我先前的討論都指出所謂的多層級的解釋。

## 分 析

分析不太容易與轉錄區分。如同 Mishler (1991b) 提到的，「我們按照我們的發現，安排和重新安排【晤談】的文本，其實就是針對我們對於言說中發生的事情的理解，加以檢測、澄清和深化的過程」（p.277）。仔細而反覆的傾聽，加上有組織的轉錄，常常能夠得到領悟，這必然會型塑出我們選擇什麼方式來呈現晤談的敘說。當我們在準備

這份報告時，當然，也會非常明顯地依賴我們所偏好的概念和理論。

在研究計畫的開始階段，並不總是能夠很清楚地知道哪些言談的內容是重要的<sup>1</sup>。我勸阻學生不要將問題定得太特殊、具體，試圖從敘說的資料中回答這類的問題，因為從定義來看，所謂分析式歸納（analytic induction）的過程會造成問題的改變，並且產生另一個新問題。

資料的化約和解釋的兩種策略的特點，在第二章已經介紹了：將資料化約成核心敘說，是 Bell 所使用的，而詩的結構分析（analysis of poetic structure）則是我所採用。這兩個例子都牽涉到從一個較長的敘說中選擇出主要的面向，對那些有興趣採用這些取向的人，如果能更精確地顯示資料化約是如何運作的，將會有所助益。（Ginsburg 並沒有提供足夠的訊息，讓我們在這裏呈現）

表 3.2 的左邊展現了某個敘說的片段，是已經再轉錄成行列形式，這是 Sarah 訴說她的 DES 的經驗。右邊是 Bell（1988）的化約。這裏核心敘說包含 Labov 模式所有的要素，除了評價以外，還提供一個概略的情節，一種可以概化的結構，研究者可以用此結構對有著相同生命事件的人，比較他們個

人的情節。

回到我將 Cindy 陳述她的情緒和重擔的說詞加以化約的地方，表 3.3 是呈現最前面 29 行的兩種不同再呈現方式。左邊是我將她的言辭再轉錄成有編號的行列，這很明顯地比 Bell 的化約還要簡短，這是因為我是受到 Gee 的架構的引導，而不是 Labov 的架構。我傾聽著訴說者在音調上的改變來斷句，而不是去注意子句在敘說中的功能。注意我對敘說文本後來的化約，表 3.3 的右邊部分已排除掉晤談者所有的語辭，以及訴說者錯誤的開始、中斷和其他會混淆我有興趣的詩的結構的一些特徵。其他的研究者會用 Gee 的取向來分析互動的情況（Mishler, 1992）。

為了避免閱讀敘說時容易僅注重其內容的傾向，以及另一個同樣危險的傾向，就是將敘說當成是先前理論的證據，所以我建議在分析敘說時，最好能從敘說的結構開始，包括：它是如何組織的？一個報導人為什麼會在對話中，以這種方式對這位聽者發展他的故事呢？在可能的範圍內，我從敘說的內部開始，從言談形式中的意義編碼開始，然後擴展到外面。舉例來說，辨認出讓這言談得以理解的潛藏的命題，包含被訴說者和傾聽者視為理所當

然的事。雖然這種策略給予訴說者的經驗某些特權，但解釋仍是不可能避免的。個人的敘說是處於人際互動之中，但同時也身處於社會的、文化的、以及制度的論述裏，這些都必須用來解釋他們的敘說。研究者也無法逃避權力這個困難的議題：最後呈現的報告中，究竟是誰的聲音？文本用其他方式解讀會有多開放？在我們所蒐集到和企圖分析的這些個人敘說中，我們是處於何種位置？以我的看法來說，我們必須將這些解釋性的議題，開放給讀者去理解。

當然，最終，研究者選擇怎麼撰寫受訪者的敘說，是跟後來逐漸演變的研究問題相關聯的，也跟研究者所持的理論和認識論的立場有關，而且這立場多半是她的個人的自傳。假使這樣的循環使得某些讀者不安的話，我只能提供關於解釋學和詮釋學研究的悠久傳統，以解除這個不安。敘說的分析的合法性（*legitimation*）是從這個傳統產生的，而且也以新的方向展延這個傳統。

表 3.2



故事一的再轉錄的版本	故事一的核心敘說
001L : 嗯 (1) 我通常開場的方式是問	摘要
002 你怎麼發現你是一位 DES 的女性	002L : 你怎麼發現你是一位 DES 的女性。
003 以及那時的感覺?	003 以及那時的感覺?
004N : (1) 嗯, 說起來很有趣, 因為這, 細節, 我所記得的也模糊不清,	狀態
005 我想, 發生的事情是 嗯 (1*) (tch**)	006N : 大約是我十九歲的時候
006 大約是我十九歲的時候,	008 那時我正在唸大學
007 我, 我們……	複雜的行動
008 那時我正在唸大學,	009 然後我去找, 一個婦產科醫生做避孕
009 我去找, 一位, 婦產科醫生, 做節育手術,	011 他是, 他發現我是個 DES 女性, 因為我有腺嘌呤核甘缺乏症 (1), 嗯,
010 然後, 我很幸運地通過我的第一次檢查,	012 所以他, 告訴, 你知道, 他告訴我 (2.5)
011 他是, 他知道我是一位 DES 的女性, 因為我曾經有過腺嘌呤核甘缺乏症 (1) 嗯,	016 之後我很快就想到
012 所以他告訴, 你知道, 他告訴我,	017 (我的母親) 想告訴我,
013 而且我不記得 (sic***)	018 嗯然後我不是說「我已經知道」,
這件事怎麼在我和母親之	

\*譯者註：停頓的秒數。

\*\*譯者註：嘆氣的速記。

\*\*\*譯者註：笑聲的速記。

	間攤開		就是，(inhale*)
014	那(1.5)那，嗯，因為她不知道我正要去找婦產科醫生	解決方式和結局	
015	她(1)	022	那時我所關心的是避孕
016	我在那之後很快地想到	023	所以我想那有點，並不，
017	她告訴我	024	它絕不會真地，變成我生命中的重要部分
018	嗯，我那時若不說「我已經知道」，要不就是，(inhale)	025	(tch)(1.5)這似乎只在我腦中輕輕掠過
019	嗯(1)但是我並沒直接從她那兒聽到		
020	嗯，我是從我的醫生那兒聽說(1.5)		
021L	： 嗯		
022N	： 那時我所關心的是避孕，		
023	所以我想那有點，並不，		
024	它絕不會真地，變成我生命中的重要部分		
025	這似乎只在我腦中輕輕掠過(tch)(1.5)		
024	它絕不會真地，變成我生命中的重要部分		
025	這似乎只在我腦中輕輕掠過(tch)(1.5)		

表 3.3

再轉錄稿		詩的結構分析	
01	有關 (p) 事情是很艱困的	框架	03 我一直游移不定
02	嗯我不知道什麼是艱困的 (sic)		04 在這狀況上持續一個月左右
03	我一直游移不定		04 在這狀況上持續一個月左右
04	在這狀況上持續一個月左右		05 感覺到事情是非常非常艱難
05	感覺到事情是非常非常艱難		06 就好像我有一朵烏雲籠罩著我
06	就好像我有一朵烏雲籠罩著我	情感和衝突	
07	而且我非常混亂	第一小節	
08	而且我不能 (P)	09	我覺得好像
09	我覺得好像	10	我超過負荷了
10	我超過負荷了	11	而且我無法想像怎麼
11	而且我無法想像怎麼	12	減輕負擔
12	減輕負擔		第二小節
13	我覺得	13	我覺得
14	我我做的每件事情我都需要做	14	我做的每件事情我都需要做
15	(P) 所以我不知道怎麼	15	所以我不知道怎麼
16	把某些負荷	16	把某些負荷
17	從我身上卸下 (P)	17	從我身上卸下
18	晤談者：為什麼你認為需要做每件事情	持續的角色衝突	
19	Cindy：(P) 嗯我我需要去工作	第三小節 (錢)	
20	為了生計	19	嗯我需要用去工作
21	(p) 我需要	20	為了生計
22	上學		第四小節 (學校)
		21	我需要

23	以便我不會總是做白工	22	上學
24	我需要	23	以便我不會總是做白工
25	當一個好媽媽		<u>第五小節(小孩)</u>
26	因為這對我來說很重要	24	我需要
27	(P) 而且 (P) 我想要	25	當一個好媽媽
28	騰出一些空間時間	26	因為這對我來說很重要
29	假使我可以的話(笑)		<u>第六小節(給自己的時間)</u>
		27	而且我想要
		28	騰出一些空間時間
		29	假使我可以的話

## 注 釋

- 1 所以必須保留所有的錄音帶。我在這個離婚的研究的早期階段，曾重複使用了某些錄音帶，就不可能從這些錄音帶裏重新轉錄敘說資料。



## 第四章

# 結 論

---



還有兩個重要的議題：敘說分析的有效性和限制。這仍然是這個領域裏未解決的問題，我在這裏開啟了這個議題，希望未來的研究者可以進一步地加以解決。

### 有效性 (Validation)

我們如何評估一個敘說分析呢？我們是否可以分辨哪一個較好、哪一個較差呢？一般驗證（*verification*）的概念和建立效度（*validity*）的程序（來自實驗模式），依賴的是實在論者（*realist*）的假設，這樣的假設結果與敘說研究大半是不相關的。個人敘說並不意圖要被視為過去所發生事件的一個正確記錄，或者是反映「外在」世界的一面鏡子。我們對於資料的閱讀，應多從它們在言說（*discourse*）中的位置來考量（例如：科學的、女性主義的、治療的）。

有些人認為藝術的標準也許可以拿來評價「模糊的文類」（*blurred genre*）（Geertz, 1983）：即一個敘說分析是否可以感動我們？如果將敘說研究視為是一種文學技藝，而非一種社會科學的活動

(Manning, 1987)，那麼藝術的標準是足夠的。雖然我很歡迎藝術性的再呈現（社會科學的書寫有太多公式性和技術性的強制），但是以我的觀點來看，這裏還需要增加一些東西。到底要增加什麼，將是這一章的主題所在。

首先，我要先提出一些警告和區分。個人陳述的歷史真實（historical truth）<sup>1</sup>並不是這裏主要的議題，因為敘事化（narrativization）就已經假定是一種觀點（point of view）。所以事實是一個解釋過程的產物，即「事實和解釋是互為需要且相互型塑的」（Stivers, 1993, p.421）。個人對於相同的事件可能建構出非常不同的敘說（Chafe, 1980），訴說的順序，與如同賽馬般有明顯前後的事情發生順序，這兩者之間有明顯的不同（Goodman, 1980）。總是有可能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敘述相同的事件，這端看敘說者的價值及興趣為何。如果訴說的是複雜和困擾的事件，這個差異「應該」會更大，因為過去是一種有選擇性的重建。當有些經驗看起來會削弱他們想要宣稱出的認同（identities）時，個人會將這些經驗加以排除（例如 Anita Hill 和 Clarence Thomas 的聽證會）。

當然，有些人會說謊（我相信 Anita Hill）。研

究者也許會應用敘說方法來試圖揭露謊言，並發現出哪些才是「真實發生的」。但是如同 Bruner (1987) 所主張的，我們應該再仔細對待驗證 (verification) 效標的問題：難道是「故事『隱藏』了生命的事件？但什麼是隱藏呢？闕漏不也是重要的嗎？……生命中令人激動的故事並不需要是一個『正確』的故事」(p.14)。情節並不是完全單純而清白的，它們隱藏了一系列的主題，決定了哪些事被包含、哪些被排除，而事實與虛構合併在一起。但：

人們所依存的故事是很少，如果有，「根本上是建構的」——它的本質並不是捏造的、「完全是無中生有的」。來自文化沉積所得關於人 (personhood) 和關係 (relationships) 的故事，都是歷史性的建構，並在人的社群裏協商而成的，以及這些故事是處於社會結構和制度的脈絡之中。(M. White, 1992, p.124)

敘說會將社會言說和權力關係編織於當中，而這些會隨著時間而有所改變（例如：界定性騷擾的範圍）。沒有理由假設一個人的敘說在不同情境中

會（或應該）完全相同。「每個訴說都代表在面對問題時的一種可能行動版本……敘述不可避免地（會引起）另類描述的可能」（Schafer, 1992, p. xvi）。例如，在嚴重創傷的案例裏，生存者的經歷和記憶有很大的距離，當遺失的細節被發現後，故事便會產生改變（Herman, 1992）。總而言之，傳統對於信度（reliability）的觀點，並不適合應用於敘說研究，而傳統效度的觀念則在根本上必須重新概念化（參閱 Mishler, 1990）。

有效性是——我們宣稱解釋是否具有信賴度（trustworthiness）的一種過程。——這是很重要的議題。「信賴度」並非「真實」（truth），在語意上有很大的差異：後者假設了一個客觀上的真實，而前者則把這個過程放入了社會的世界裏。這裏我們至少有四種方式來探究敘說研究的有效性，當然每種方式有其可能性，也有其自身的問題。

### 說服力（persuasiveness）

首先，說服力這個標準有一個相似的姻親——合理性（plausibility），即這個解釋是否有道理或能否讓人信服？我們都有過這種經驗，在閱讀一份研

究時，儘管這個解釋可能違反了常識，但是仍然覺得「這是說得通的」（我的經驗是閱讀 Ginsburg (1989a) 的《競爭中的生命》(Contested Lives)）。當其他的解釋都已經加以考量後，而理論的宣稱又能夠受到報導者陳述的支持與證明，這時說服力就會大增。這個標準促使我們可以從具有質疑的局外人獲得裨益，而發展出解釋性的陳述。

然而，Van Maanen (1988) 巧妙地顯示了，不同的修辭風格都同樣地有說服力（奇怪的是，他很少談到效度問題）。成功需要依賴於「分析者邀請、驅使、刺激、感動聽眾的能力……而不是依賴真實性標準」（Gergen, 1985, p.272）。說服力最終是要依賴於寫作的修辭（文學的技巧）以及讀者的反應。在某個歷史時刻裏，一個敘說文本的最具說服力的解釋，在後來的另一時刻未必是如此，我們的文本並沒有穩定不變的意義。

### 符合度 (correspondence)

其次，一個研究者可以把結果帶回到那些被研究者處。Lincoln 和 Guba (1985) 就描述了「成員檢覈 (member checks) (的程序)：資料、分析的

類別、解釋和結論都可以……由那些所蒐集資料的原來的群體……加以檢視」（p.314）。如果研究者的再建構被認為是適切的再呈現，Lincoln 和 Guba 認為可信度（credibility）就會提高。在人類學裏，報導人開始被認為是協同作者（參閱 Behar, 1993），「民族誌學者可視為謄稿者，及檔案研究學者（archivist），也可被視為解釋性的觀察者。」（Clifford, 1986, p.17）

根據一般的習慣，將研究成果提供給參與這個研究的個人或群體是應當做的事。在前面的例子裏，Bell 就提供給受訪的 DES 女兒相關的謄本，有時給予完全的謄本。同時讓她們檢覈最終的出版版本裏任何被引用的文句是否有被誤解，並確保報導人的身分有適當的掩飾，並同意採用某個特定的敘說（同時請參閱 Roberts, 1992）。參與者對於研究結果的看法，對於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因為他們的反應常常是理論啟發的來源。另外，把我們的解釋帶回到他們原本的社群，在政治上（politically）也是很重要的。當北達科他州 Fargo 的行動者看到了 Ginsburg（1989a）對於她們墮胎掙扎的分析時，這可以讓那些原先認為沒有任何共同點的婦女之間產生一些對話的空間。一個研究後續的發展也可以

如同研究本身那樣具有啟發性（Blackman, 1992）。

一個研究者解釋的效度是否可以經由成員檢覈就得以確立，這還是令人質疑的。人的故事並不是靜止的，當我們的意識變遷了，經驗的意義也就隨之改變。同時我們參照許多的敘說將之理論化，也無法由個別的敘說者來加以評價。他們甚至可能不同意我們所作的解釋（因此，儘可能我們要區辨出我們對研究對象的觀點，以及他們對於自己的觀點之間的不同，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參閱 Stivers, 1993）。到了最後的分析階段，研究結果是屬於研究者的。因此，我們必須對於它的真實負責。

### 連貫性（coherence）

其三，是關於連貫性的標準。Agar 和 Hobbs（1982）區別出三種：總體的（global）、局部的（local）和主題的（thematic）。為顯示解釋並不只有單一特定的目的，連貫性必須儘可能的「深厚」（thick），理想上應該要涵蓋到這三個層級。總體的連貫性是指，敘說者藉由訴說所要達到的整體的目的。例如，這可能是被訪問者希望對別人說一個關於過去行動的故事。或者這個目的可能是策略性

的——印象整飭（impression management），就如同我在離婚研究中所主張的（Riessman, 1990a）：一位敘說者的（總體的）目的是發展一個陳述（經由訴說），來證明這個行動（離婚）的合理性。局部的連貫性是，一位敘說者嘗試在敘說裏影響敘說本身，例如使用語言的設計將事件彼此聯結。回到前面提到的離婚敘說，個人會使用對比法（事件和行動並置）來呈現他們的觀點（例如：訴說者在婚姻中互動「應該」視什麼情況，而實際上的說明又剛好相反，兩者配對在一起說明）。主題的連貫性牽涉到的是內容：關於基本特定主題的大段的訪談文本說明其重要性，而且不斷重複地出現。再次使用離婚的例子來說，個人會圍繞著一套共同的主題，以發展出他們的敘說（例如：缺乏親密或陪伴），而在訪談裏，某個主題會一再地重複運用。

在一個與海洛因成癮者的訪談裏，Agar和Hobbs（1982）顯示了，對於相同的言說問題，這三種連貫性有時可以提供不同的觀點，有時候也會增強了相同的觀點。但是「如果某個說法在這三種連貫性裏，都顯得可以被理解，則這樣的解釋就加強了」（p.29）。

研究者必須持續修改關於訴說者信念與目的

（總體連貫性）的最初假設，以啟發對於特定敘說結構（局部連貫性）以及統整文本中反覆性主題（主題連貫性）的理解。對於意義的解釋，在這些重要方向上都受到文本的限制，但也提供了對特定的理論檢覈的機會。要把 Agar 和 Hobbs 的架構應用到訪談的互動情況是有困難的，因為這個模式是假定了一位理性的訴說者，訴說其言說計畫，但這個假定也許並不適用於所有的研究者。

### 實用性 (pragmatic use)

最後，我們要考慮某個特定的研究，最終能夠變成其他研究之基礎的程度。相較於其他的有效性標準，這個標準是未來導向的、集體性質的、且認為具有社會建構的特性。Mishler (1990) 主張「知識的有效性，建築在科學家的社群之中，而這些科學家對思考及解決問題共享了一套沒有爭議及有用的方式」（p.422）。對於常態科學的保守本質而言（Kuhn, 1962/1970），若要將：

研究的概念、方法和推論，或是研究的傳統，  
這些作為我們自己理論化或經驗研究所依賴的

基礎，並不是容易的事。如果我們評判一個研究的信賴度（trustworthiness）夠高，足夠讓我們願意參與其中，這表示我們認可研究結果具有足夠的效度，願意投資我們的時間及精力，並且拿著我們自己的名聲（作為一個有能力的研究者）冒險。（Mishler, 1990, p.419）

儘管 Mishler 用一種令人注目的方式來思考這個問題，但他的解決方式並不能幫助個別的研究者，如何在研究報告裏討論關於敘說分析的效度問題。其實我們是可以提供相關的訊息，讓其他人能夠決定我們成果的信賴度為何：①描述解釋是如何形成的；②讓我們進行的過程被看到；③詳細地說明我們如何達成成功的轉換（參閱圖 1-1）；④讓基本資料也可以提供給其他研究者。回到我們在第二章舉的例子，Bell（1988）讓敘說完整的謄本能提供給需要的人索取，而我自己在再呈現詩節及段落時，旁邊同時隨附完整的文本。此外，我們可以把我們認為的「基本假定（和價值）拿到檯面上來，而不是把它們隱匿在科學的方法論策略之下」（Agger, 1991, p.120）。

## 無教條 (no canon)

從上面大略地說明，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發現，關於敘說研究的有效性是無法化約成一套形式規則或標準的技術程序（就算是在量化研究中，有效性的認定也是不足的，參閱 Messick, 1987）。來自不同的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都表達了相似的想法：

科學已經受到某種迷思所蠱惑，認為專心一致地運用嚴格的方法，將可以生產出確定的事實——這就像把實證方法論當作是某種形式的絞肉機，而真實就可以像香腸般地被製造出來。（Gergen, 1985, p.273）

我們所說的故事，就像我們所提的問題一樣，最後都是和價值有關的。（Cronon, 1992, p. 1376）

民族誌的真實……本質上是部分承諾的及不完全的。（Clifford, 1986, p.7）

在解釋性的研究裏，並沒有教條性的取向，這裏沒有固定的食譜和公式。而某種有效性認定過程對某些研究問題較為適合，對其他問題則未必。例如，即便敘說者和分析者的看法可能會有差異，且不相吻合，個案研究中若能被報導者所認可（符合度），這對於研究有效性的認定是很有用的。對於比較性個案研究，合理性和連貫性也許是較為適當的標準。對於從敘說發展出來的更為一般性的理論，將依賴它對於其他人的有用程度（實用性標準）。解釋性研究的有效性認定還是一個正在進行的、艱難的議題，需要敘說學者的關注（關於質化研究裏對於這個主題的其他討論，參閱 Cronon, 1992; Kata, 1983; Kirk & Miller, 1986; Lather, 1986; Lincoln & Guba, 1985; Packer & Addison, 1989）。

## 敘說分析的使用和限制

我在這本書裏所採取的描述取向，對於以口語的、第一人稱式的經驗陳述是適合的，Labov和Walczky（1967）稱這種特定形式的經驗為「自然的敘說」（*natural narrative*）。如果資料包括文字敘說

（如信件）、檔案口述歷史、自傳、研究者的記錄、科學的再呈現報告、甚至理論本身，相當程度的調整或合併採用其他的方法將是必要的。

敘說分析對那些以大量匿名、不表明身分者為受試的研究，並沒有多大用處。這種方法是進度緩慢和辛苦的。它需要關注於細微處：話語的細微差異、受訪者回應的組織、敘說成品時當下的脈絡、那些型塑訴說的社會論述以及內隱而不能說出的部分。對於那些只想對受訪者的生命尋求一種簡單而不受阻礙的觀點，這種方式顯然是不適合的。對那些語言視作一種透明的媒介的人，分析的細節對他們來說是過於多餘的。就如這本書一開始所指出的，社會理論的發展應當小心地處理語言的複雜性，包括它的建構面向；其中一個危險是敘說分析會將語言的結構具體化。

敘說研究裏有一種緊張關係，一方面追求類化，另一方面則重視讓受訪者的話語「展露」（unpacking）其意義，以及對敘說形式的仔細關注。我們最終的目的如同社會科學家，希望理解外在世界，經由方法來形成理論宣稱，並從個別的案例中得到普遍的形式。由此看來，個人的行動和傳記應該是分析的起點，而不是研究的終點。諷刺的是，

Ginsburg (1989a) 可以從不同的個案中得到類化。對於其他人來說，要經由訪談過程所得的個人敘說，跨越不同的訪談形成實質的內容觀點並不容易。如果我們想要顯示出變異性，超過一個以上的個案是必須的。為了達到理論的抽象層次，我們往往要進行比較性的工作。但是敘說研究裏的研究樣本通常不大，而個案通常也來自沒有什麼代表性的群體。雖然有這個限制，但是精彩和長久的理論，卻往往是對少數個案進行仔細的觀察，從當中累積而發展出來的（例如：Breuer 的 Anna O.（安娜·歐），Garfinkel 的 Agnus，Piaget 的孩子）。科學裏長久以來就有一個傳統，從個案來建立推論。

敘說的方法可以和其他形式的質化分析結合，甚至可以和量化分析結合（這在之前已經論述過了）。但是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關於基礎認識論上的基本功是必要的，因為，作為敘說基石的詮釋學觀點，與許多其他形式的質化分析以及量化研究所依靠的實在論假定，有很大的差異。方法上的結合使得研究者必須面對麻煩的哲學問題，並且要教育讀者理解這些差異。科學無法只由一種單一普同的聲音發聲。任何方法論的立場（根據其定義），都是部分、不完全的，而且是歷史性的偶然（his-

torically contingent)。不同形式的再呈現是必要的，而敘說分析只是其中一種取向，它並不是萬靈丹。對某些研究的處境，敘說分析是適用的，但對於其他則未必。對於社會科學方法這鍋肉湯來說，敘說分析是有用的添加物，為這先前已經失去味道的湯頭帶來重要的調味。因為敘說分析允許對個人經驗和意義進行系統性研究：亦即，事件是如何被行動的主體所建構出來的。

## 注 釋

- 1 Spence (1982, p.30-33) 在精神分析領域，區分了歷史的事實和敘說的真實。

# 參考文獻

---



- Agar, M., & Hobbs, J. R. (1982). Interpreting discourse: Coherence and the analysis of ethnographic interviews. *Discourse Processes*, 5, 1-32.
- Agger, B. (1991). Critical theory, poststructuralism, postmodernism: Their sociological relevanc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7, 105-131.
- Anderson, K., & Jack, D. C. (1991). Learning to listen: Interview techniques and analyses. In S. B. Gluck & D. Patai (Eds.), *Women's words: The feminist practice of oral history* (pp.11-26). New York: Routledge.
- Arendt, H. (1958).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tkinson, P. (1990). *The ethnographic imagination: Textual constructions of reality*. New York: Routledge.
- Attanucci, J. (1991). Changing subjects: Growing up and growing older.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20, 317-328.
- Bakhtin, M. (1981).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Barthes, R. (1974). *Introduction to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narrative* (R. Miller, Tran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 Behar, R. (1993). *Translated woman: Crossing the border with Esperanza's story*. Boston: Beacon.
- Bell, S. E. (1988). Becoming a political woman: The reconstr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experience through stories. In A. D. Todd & S. Fisher (Eds.), *Gender and discourse: The power of talk* (pp. 97-123). Norwood, NJ: Ablex.
- Bell, S. E. (1991). Commentary on "Perspectives on embodiment: The uses of narrativity in ethnographic writing." *Journal of Narrative and Life History*, 1 (3), 245-254.
- Bennett, T. (1989). From defense to offense. *Women's Review of Books*, 7(3), 14-15.
- Berger, P. L., & Luckmann, T.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Doubleday.
- Bertaux, D., & Kohli, M. (1984). The life story approach: A continental view.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0, 215-237.
- Blackman, M. B. (1992). The afterlife of the life history. *Journal of Narrative and Life History*, 2(1), 1-9.

- Boje, D. M. (1991). The storytelling organization: A Study of story performance in an office-supply firm.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6, 106-126.
- Brown, L. M., Tappan, M. B., Gilligan, C., Miller, B. A., & Argyris, D. E. (1989). Reading for self and moral voice: A method of interpreting narratives of real-life moral conflict and choice. In M. J. Packer & R. B. Addison (Eds.), *Entering the circle Hermeneutic investigation in psychology* (pp.141-164).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Bruner, J. (1986). *Actual minds, possible world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runer, J. (1987). Life as narrative. *Social Research*, 54 (1), 11-32.
- Bruner, J. (1990). *Acts of mean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urke, K. (1945). Introduction: The five key terms of dramatism. In K. Burke, *A grammar of motives* (pp. xv-xxiii). New York: Prentice-Hall
- Burke, K. (1950). *A rhetoric of motives*. New York: Prentice-Hall.
- Bury, M. (1982). Chronic illness as biographical disrupt-

- tion.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4(2), 167-182.
- Chafe, W. L. (Ed.). (1980). *The pear stories: Cognitive,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aspects of narrative production*. Norwood, NJ: Ablex.
- Charon, R. (1986). To render the lives of patients. *Literature and Medicine*, 5, 58-74.
- Charon, R. (1989). Doctor-patient/reader-writer: Learning to the text. *Soundings*, 72, 1101-1116.
- Chase, S. E., & Bell, C. S. (in press). Interpreting the complexity of women's subjectivity. In K. Rogers & E. McMahan (Eds.), *Interactive oral interviewing*.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 Clark, J. A., & Mishler, E. G. (1992). Attending to patients' stories: Reframing the clinical task.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14(3), 344-372.
- Clifford, J. (1986). Partial truths. In J. Clifford & G. 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pp.1.2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lifford, J. (1988).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Twentieth-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 and ar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lifford, J., & Marcus, G. E. (Eds.). (1986).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hler, B. J. (1982). Personal narrative and life course. *Life-span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 4, 205-241.
- Cronon, W. (1992). A place for stories: Nature, history, and narrativ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8(4), 1347-1376.
- Culler, J. (1980). Fabula and sjuzhet in the analysis of narrative: Some American discussions. *Poetics Today*, 1, 27-37.
- Denzin, N. (1988). *Interpretive interactionism*. Newbury Park, CA: Sage.
- DeVault, M. L. (1990). Talking and listening from women's standpoint: Feminist strategies for interviewing and analysis. *Social Problems*, 37(1), 96-116.
- Eagleton, T. (1983).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Ellis, C., & Flaherty, M. G.(Eds.). (1992). *Investigating subjectivity: Research on lived experience*. Newbury Park CK Sage.
- Essed, R. (1988). Understanding verbal accounts of rac-

- ism: Politics and heuristics of reality construction.  
*Text*, 8(1-2), 5-40.
- Fish, S. (1980). Introduction, or how I stopped worrying and learned to love interpretation. In S. Fish, *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 (pp.14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Fonow, M. M., & Cook, J. A. (Eds.). (1991). *Beyond methodology: Feminist scholarship as lived research*.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Gee, J. P. (1985). The narrativiation of experience in the oral Style. *Journal of Education*, 167(1),9-35.
- Gee, J. P. (1986). Units in the production of narrative discourse. *Discourse Processes*, 9, 391-422.
- Gee, J. R. (1991). A linguistic approach to narrative. *Journal of Narrative and Life History*, 1(1), 15-39.
- Geertz, C.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Geertz, C. (1983). Blurred genres: The refiguration of social thought. In C. Geertz,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pp: 19-35).New York: Basic Books.
- Geiger, S. N. G. (1986). Women's life histories: Method

- and content.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11(2), 334-351.
- Gergen, K. J. (1985). The social constructionist movement in modern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y*, 40(3), 266-275.
- Gilligan, C. (1982).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insburg, F. D. (1989a). *Contested lives: The abortion debate in an American commu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insburg, F. (1989b). Dissonance and harmony: The symbolic function of abortion in activists' life Stories. In Personal Narratives Group (Ed.), *Interpreting women's lives: Feminist theory and personal narratives* (pp: 59-84).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Gluck, S. B., & Patai, D. (Eds.). (1991). *Women's words: The feminist practice of oral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 Godzich W. (1989). The time machine. In W.Godzich & J. Schulte-Sase (Eds.), *Theory and history of lit-*

- erature: Vol. 64. *Narrative on communication* (pp. ix-xvi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Doubleday.
- Goffman, E. (1974). *Frame analysis*. New York: Harper & Row.
- Goode, W. J. (1956). *Women in divorce*. New York: Free Press.
- Goodman, N. (1980). Twisted tales, or, story, study, and symphony. In W.J.T. Mitchell(Ed.), *On narrative* (pp.99-11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orelick, S. (1991). Contradictions of feminist methodology. *Gender & Society*, 5, 459-477.
- Greenley, A. (1992). *Social theory, social research, and storytelling*. Special session organized and presided by A. Greenley at the annual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Convention, Pittsburgh, PA.
- Gusfield, J. R. (1989, February). Sociology and the humanities closing the gap. *Footnotes*, pp.1, 10.
- Halliday, M.A.K. (1973). *Explorations in the functions of language*. London: Edward Arnold.

- Heidegger, M. (1927/962). *Being and time*. (J. Macquarrie & E. Robinson, Trans.). New York: Harper & Row.
- Heman, J. L. (1992). *Trauma and recovery*. New York: Basic Books.
- Hollway, W. (1989). *Subjectivity and method in psychology: Gender meaning, and science*. London: Sage.
- Hooks, B. (1989). *Talking back: Thinking feminist-thinking black*. Boston: South End Press.
- Husserl, E. (1973). *Experience and judgement: Investigation in a genealogy of logic* (J. S. Churchill & Amerikas, Trans.).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9)
- Hyd(n, M. (1992). *Women battering as marital act: The construction of a violent marriag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Stockholm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Stockholm, Sweden.
- Jack, D. C. (1991). *Silencing the self: Women and depress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Jameson, F. (1972). *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isty Press.

- Jefferson, G. (1979). Sequential aspects of storytelling in conversation. In J. Schenkein (Ed.), *Studies in the organization of conversational interaction* (pp. 219-248).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Katz, J. (1983). A theory of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The social system of analytic fieldwork. In R. M. Emerson (Ed.), *Contemporary field research: A collection of readings* (pp.127-148). Boston: Little , Brown.
- Kirk, J., & Miller, M. L. (1986).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Series. Vol. 1). Beverly Hills, CA: Sage.
- Kleinman, A. (1988). *The illness narratives: Suffering, healing, and the human condi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 Kuhn, T. 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2)
- Labov, W. (Ed.). (1972). The transformation of experience in narrative syntax. In W. Labov (Ed.), *Language in the inner city: Studies in the Black English vernacular* (pp.354-396).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Labov, W. (1982). Speech actions and reactions in personal narrative. In D. Tannen (Ed.), *Analyzing discourse: Text and talk* (pp.219-247).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Labov, W., & Waletzky, J. (1967). Narrative analysis: Oral versions of personal experience. In J. Helm (Ed.), *Essays on the verbal and visual arts* (pp. 12-44).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Iaird, J. (1988). Women and stories: restorying women's self-constructions. In M. McGoldrick, C. Anderson, & F. Walsh (Eds), *Women in families: A framework for family therapy* (pp.427-450). New York: Norton.

Laird, J. (in press). Changing women's narratives: Taking back the discourse. In L. Davis (Ed.), *Building on women 's strength :A social work agenda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Haworth.

Landau, M. (1984). Human evolution as narrative. *American Scientist*, 72, 262-468.

Langellier, K. M. (1989). Personal narratives: Perspectives on theory and research. *Text and Performance*

*Quarterly*, 9(4), 243-276.

Lather, R. (1986). Issues of validity in openly ideological research: Between a rock and a soft place. *Interchange*, 17(4), 63-84.

Legal storytelling [Special issue]. (1980). *Michigan law Review*, 87(8).

Lincoln, Y.S., & Guba, E. G.(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Beverly Hills, CA: Sage.

Lynch, M., & Woolgar, S. (Eds.). (1990). *Representation in scientific practi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Manning, P. K. (1987). *Semiotics and Fieldwork*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Vol, 7). Beverly Hills, CA: Sage.

Martin, W. (1986). *Recent theories of narrativ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McAdams, D. R., & Ochberg, R. L. (Eds.). (1988). Psychobiography and life narratives [Special issu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56(1).

McCabe, A. (1991). Haiku as discourse regulation device. *Language and Society*, 20(4), 577-599.

McCabe, A. (in press). *Chameleon readers*. New York: McGraw-Hill.

- McCabe, A., & Peterson, C. (Eds.). (1991). *Developing narrative structure*.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 Merleau-Ponty, M. (1989).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C. Smith-Trans.). London: Routledg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2)
- Merton, R. K., Fish, M., & Kendall, R. (1990). *The focused interview: A manual of problems and procedures*. New York: Free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6)
- Messick, S. (1987). *Validity*. Princeton, NJ: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 Michaels, S. (1981). "Sharing time": Children's narrative Styles and differential access to literacy. *Language and Society*, 10, 423-442.
- Millett, K. (1971). *The prostitution papers: A candid dialogue*. New York: Avon.
- Mishler, E. G. (1984). *The discourse of medicine: Dialectics of medical interviews*. Norwood, NJ: Ablex.
- Mishler, E. G. (1986a). *Research interviewing: Context and narrativ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ishler, E. G. (1986b). The analysis of interview-narratives. In T. R. Sarbin (Ed.), *Narrative psychology: The storied nature of human conduct* (pp.233-255). New York: Praeger.
- Mishler, E. G. (1990). Validation in inquiry-guided research: The role of exemplars in Narrative Studies.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60(4), 415-442.
- Mishler, E. G. (1991a). Once upon a time. *Journal of Narrative and Life History*, 1(2), 101-108.
- Mishler, E. G. (1991b). Representing discourse: The rhetoric of transcription. *Journal of Narrative and Life History*, 1(4), 255-280.
- Mishler, E. G. (1992, August). *Narrative accounts in clinical and research interviews*. Paper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n Discourse and the Professions. Swedish Association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Uppsala University, Sweden.
- Mishler, E. G., Clark, J. A., Ingelfinger, J., & Simon, M. P. (1989). The language of attentive patient care: A comparison of two medical interviews. *Journal of 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 4, 325-335.
- Mitchell, W.J.T. (1990). Representation. In F. Lentric-

chia & T. McLaughlin (Eds.), *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 (pp.11-2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Nagel, T. (1986). *The view from nowhe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lson, K. (1989). *Narratives from the crib*.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Ochs, E. (1979). Transcription as theory. In E. Ochs & B. B. Schieffelin (Eds.), *Developmental pragmatics* (pp.43-7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acker, M. A., & Addison, R.B. (Eds.). (1989). *Entering the circle: Hermeneutic investigation in psycholog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aget, M. A. (1983).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Human Studies*, 6, 67-90.

Peacock, J. (1992). Afterlives. *Journal of Narrative and Life History*, 2(1), 75-79.

Peller, G. (1987). Reason and the mob: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Tikkun*, 2(3), 28-95.

Personal Narratives Group.(1989a).Truth. In Personal Narratives Group (Eds.). *Interpreting women's lives: Feminist theory and personal narratives* (pp.

- 261-264).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Personal Narratives Group (Eds.). (1989b). *Interpreting women's lives: Feminist theory and personal narratives*.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Polanyi, L. (1985). *Telling the American Story: A structural and cultural analysis of conversational storytelling*. Norwood, NJ: Ablex.
- Polkinghorne, D. E. (1988). *Narrative knowing and the human scienc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Rabinow, R. & Sullivan, W. M. (1987). *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 A second loo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9)
- Reinharz, S. (1992). *Feminist method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ichardson, L. (1990). *Writing Strategies: Reaching diverse audience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Series. Vol. 21). Newbury Park, CA: Sage.
- Richardson, L. (1992). The consequences of poetic presentation: writing the other, rewriting the self. In C. Ellis & M. G. Flaherty (Eds.). *Investigating subject-*

- tivity: Research on lived experience* (pp.125-140).  
Newbury Park CA: Sage.
- Ricoeur, P. (1981).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Essays on language, a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J. B. Thompson, Trans.).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icoeur, P. (1984). *Time and narrativ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iessman, C. K. (1987). When gender is not enough: Women interviewing women. *Gender & Society*, 1 (2), 172-207.
- Riessman, C.K. (1990a). *Divorce talk: Women and men make sense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Riessman, C. K. (1990b). Strategic uses of narrative i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and illnes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30(11), 1195-1200.
- Riessman, C. K. (1991). Beyond reductionism: Narrative genres in divorce accounts. *Journal of Narrative and Life History*, 1(1), 41-68.
- Riessman, C. K. (1992). Making sense of marital violence: One woman's narrative. In G. C. Rosenwald

- & R. L. Ochberg (Eds.). *Storied live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self-understanding* (pp.231-249).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Roberts, H. (1992). Answering back: The role of respondents in women's health research .In H. Roberts (Ed.), *Women's health matters* (pp.176-192). New York: Routledge, Chapman, and Hall.
- Rollins, J. (1985). Introduction. In J. Rollins, *Between women: Domesticity and their employers* (pp.5-17).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Rosaldo, R. (1989). *Culture and truth: The remaking of social analysis*. Boston: Beacon.
- Rosenwald, G. C., & Ochberg, R. L. (Eds.). (1992a). *Storied live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self-understanding*.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Rosenwald, G. C., & Ochberg, R. L. (1992b). Introduction: Life Stories, cultural politics, and self-understanding. In G. C. Rosenwald & R. L. Ochberg (Eds.), *Storied live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self-understanding* (pp.1-18).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Roth, S. (1993). Speaking the unspoken: A work-group

- consultation to reopen dialogue. In E. Imber-Black (Ed.), *Secrets in families and family therapy* (pp. 268-291). New York: Norton.
- Ruzek, S. B. (1979). *The women-health movement*. New York: Praeger.
- Said, E. W. (1979).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 Sandelowski, M. (1991). Telling Stories: Narrative approache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mage: Journal of Nursing Scholars*, 23(3), 161-166.
- Sarbin, T. R. (1986a). The narrative as a root metaphor for psychology. In T. R. Sarbin (Ed.), *Narrative psychology: The storied nature of human conduct* (pp.3-21). New York Praeger.
- Sarbin, T. R. (Ed.). (1986b). *Narrative psychology: The storied nature of human conduct*. New York: Praeger.
- Schafer, R. (1980). Narration in the psychoanalytic dialogue. *Critical Inquiry*, 7(1), 29-54.
- Schafer, R. (1992). *Retelling a life: Narration and dialogue in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Basic Books.
- Scheff, T. J. (1990). *Microsociology: Discourse, Emo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chutz, A. (1967).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ocial world* (G. Walsh & R Lehnert , Trans.). New York: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2)

Shaw, C. (1938). *The jack-roller: A delinquent boy's own 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human, A. (1986). *Storytelling rights: The uses of oral and written texts by urban adolescent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lavney, P. R., & McHugh, P. R. (1984). Life stories and meaningful connections: Reflections on a clinical method in psychiatry medicine. *Perspectives in Biology & Medicine*, 27, 279-288.

Smith, D. E. (1987). *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 A feminist sociology*.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Sosnoski, J. S. (1991). A mindless man-driven theory machine: Intellectualists, sexualists, and the institution of criticism. In R. R. Warhol & D. R. Herndl (Eds.), *Feminism: An anthology of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pp.40-57). New Brunswick NJ: Ru-

- tgers University Press.
- Spence, D. R. (1982). *Narrative truth and historical truth: Meaning and interpretation in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Norton.
- Stewart, D., & Mickunas, A. (1990). *Exploring phenomenology: A guide to the field and its literature*.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 Stivers, C. (1993). Reflections on the role of personal narrative in social science.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18(2), 408-425.
- Tannen, D.(1990). Ordinary conversation and literary discourse: Coherence and the poetics of repetition. In E. H. Benclix (Ed.), *The uses of linguistics* (pp. 15-32). New York: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 Toolan, M. J. (1988). *Narrative: A critical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Van Maanen, J. (1988). *Tales of the Field: On writing ethnogra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Veroff, J., Sutherland, L., Chadiha, L., & Ortega, R. M. (in press). Newlyweds tell their Stories: A narrative

method for assessing marital experiences. *Journal of Personal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West, C. (1984). *Routine complication: Trouble with talk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White, H. (1973). *Metahistory*. Baltimore, MD: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White, H. (1981). The value of narrativity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 J. T. Mitchell (Ed.), *On narrative* (pp.1-2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hite, H. (1989). The rhetoric of interpretation. In P. Hernadi (Ed.), *The rhetoric of interpretation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rhetoric* (pp.1-22).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White, J. B. (1984). *When words lose their meaning: Constitution and reconstitutions of language, character and communit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White, M. (1992). Deconstruction and therapy. In D. Epston & M. White (Ed.), *Experience, contradiction, narrative, and imagination* (pp.109-147).

- South Australia: Dulwich Centre.
- White, M., & Epston, D. (1990). *Narrative means to therapeutic ends*. New York: Norton.
- Whyte, W. F. (1943). *Street corner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illiams, G. (1984). The genesis of chronic illness: Narrative re-construction.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6(2), 175-200.
- Williams, P. J. (1991). *The alchemy of race ad rights: Diary of a law professo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itherell, C. & Noddings, N. (Eds.). (1991). *Stories lives tell: Narrative and dialogue in education*.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 Wok, D., & Hicks, D. (1989). The voices within narrativ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textuality in young children's stories. *Discourse Processes*, 12, 329-351.
- Wolf, M. (1992). *A thrice told tale: Feminism, postmodernism and ethnographic responsibili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Yans-McLaughlin, V. (1990). Metaphors of self in his-

- tory: Subjectivity, oral narrative, and immigration Studies. In V. Yans-McLaughlin (Ed.), *Immigration reconsidered: History, sociology, and politics* (pp.254-28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Young, K. G. (1987). *Taleworlds and storyrealm: The phenomenology of narrative*.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 Young, K. (1989). Narrative embodiments: Enclaves of the self in the realm of medicine. In J. Shotter & K. J. Gergen (Ed.), *Texts of identity* (pp.152-165). London: Sage.

# 名詞索引



- sociolinguists 社會語言學家 序 2
- medical sociology 醫療社會學 序 3
- code 編碼 序 4
- 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 解釋社會科學 序 5
- interpretive turn 解釋的轉向 3
- narratology 敘說學 3
- first-person accounts 第一人稱陳述 4
- master narratives 大敘說 4
- representations 再呈現 4
- deep structure 深層結構 5
- discourse 言說（論述） 6
- life course 生命進程 6
- narrativize 敘事化 7
- prenarrative 前敘說 8
- Chicago School 芝加哥學派 9
- semiotics 符號學 10
- hermeneutics 詮釋學 10
- conversation and discourse  
analysis 對話與言說分析 10
- textual approaches 文本取向 10
- deconstructive method 解構方法 11
- social constructionism 社會建構主義 11

the humanities	人文學科	11
blurred genres	模糊的文類	11
subjectivity	主觀性（主體性）	11
identity	認同	11
text	文本	16
the representation of experience	經驗的再呈現	19
phenomenology	現象學	21
inalienable presence	不可異化的存在	21
natural attitude	自然的態度	21
attending experience	關注經驗	22
telling experience	訴說經驗	23
prison house of language	語言的牢房	24
fixation	固著	26
transcribing experience	轉錄經驗	26
picture reality	圖象真實	29
transcript	謄本（逐字稿）	30
epiphanies	主顯節	30
metastroy	後設故事	30
analyzing experience	分析經驗	30
reading experience	閱讀經驗	31
false document	虛構的文件	31
plurivocal	多重聲音	32

- primary experience 基本經驗 34
- sequence 次序（順序） 38
- chronological sequence 編年式的次序 39
- consequential sequencing 後果式的次序 39
- thematic sequencing 主題式的次序 39
- theme 主題 39
- episodic 單元故事 39
- narrative genres 敘說文類 39
- habitual narratives 習慣式敘說 40
- hypothetical narratives 假設式敘說 40
- topic-centered narratives 主題式敘說 40
- narrative structure 敘說結構 41
- Labov's structural approach Lobov 的結構取向 41
- an abstract 摘要 41
- orientation 狀態 41
- complicating action 複雜行動 41
- evaluation 評價 41
- resolution 解決方式 41
- coda 結局 41
- Burke's dramatism Burke 的劇本主義 42
- act 行動 42
- scene 場景 42

agent	行動者 42
agency	行動方式 42
purpose	目的 42
poetic structural approach of Gee	Gee 的詩的結 構取向 43
stanzas	詩段 43
strophes	詩節 43
plot type	情節類型 43
tragedy	悲劇 43
comedy	喜劇 43
romance	羅曼史 43
satire	諷刺劇 43
evaluation clauses	評價的子句 44
language functions	語言的功能 46
ideational function	理念的功能 46
interpersonal function	人際間的功能 46
textual function	文本的功能 46
syntactical	造句法 46
sematical	語意的 46
narrative truths	敘說真實 48
descriptive realism	描述性實在論 48
root metaphor	基本隱喻 48

- self-evident 自我證成 49
- heuristic 捷思 51
- plot-story distinction 情節——故事  
區分 57
- structural approaches of Labov and Mishler Labov 和  
Mishler 的結構  
取向 57
- agency 能動性 58
- exemplars 範例 59
- tacit knowledge 默會知識 59
- life story 生命故事 59
- agent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社會轉變下的行動  
者 60
- story 故事 60
- individual transformation 個體轉變 60
- formalist 形式主義者 66
- sjuzet 情節 67
- fabula 故事 67
- archival materials 檔案資料 71
- archival oral histories 檔案口述歷史 74
- core narrative 主要敘說 78
- microsociological 微觀社會學 88

stanza	小節 101
theory of the units of speech	言說單位的 理論 108
discourse marker	言說標記詞 109
narrativization	敘事化 119
legitimation	合法性 134
validation	有效性 143
validity	效度 143
reliability	信度 146
trustworthiness	信賴度 146
persuasiveness	說服力 146
plausibility	合理性 146
correspondence	符合度 147
member checks	成員檢覈 147
credibility	可信度 148
archivist	檔案研究學者 148
coherence	連貫性 149
global coherence	總體連貫性 149
local coherence	局部連貫性 149
thematic coherence	主題連貫性 149
thick	深厚 149
impression management	印象整飭 150

pragmatic use

no canon

natural narrative

實用性 151

無教條（沒有  
規範） 153

自然的敘說 154

193

名詞索引





# NARRATIVE ANALYSIS

# 敘說分析

##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Riessman的這本「敘說分析」的中譯本，可以說是在學習「敘說」的光譜上，有著關鍵性的開拓。Riessman這本「敘說分析」在理論脈絡下，討論了三種不同的敘說操作模式（models），讓讀者在讀敘說資料時，不僅只欣賞故事，還能進入分析性思考，接著Riessman提供了如何分析的具體方法，最後討論評估標準及這種分析的限制。這樣的組織實在有助於有意學習敘說者很快地進入敘說分析的世界。

